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编写

中共党史 青少年读本

张树军 武国友 编著

中共党史青少年读本

张树军 武国友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党史青少年读本/张树军, 武国友编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300-13789-6

I. ①中… II. ①张…②武…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青年读物②中国共产党-党史-少年读物 IV. ①D2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9876 号

中共党史青少年读本

张树军 武国友 编著

Zhonggongdangshi Qingshaonian Dube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3.5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2 0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 中 · 共 · 党 · 史 · 青 · 少 · 年 · 读 · 本 ·

中国共产党的90华诞即将来临，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每当节庆之际总要给亲者长者送上一份贺礼。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当然也存有这样的一种心理，不过，对于党的90华诞来说，我们奉献的绝不是俗常的享用品，而是一道供广大青少年朋友共同享用的精神美餐，饱含党的优良传统的《中共党史青少年读本》，旨在使党的高大形象矗立于广大青少年的心中。

中共党史就是一部资政育人的教科书。1998年10月22日，江泽民同志曾亲笔致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写道：“我在十五届二中全会上讲过，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涵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我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党史工作，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话，指出了党史工作的重要性。的确，党史工作应当发挥其他任何社会科学都不可替代的资政育人作用。古人已经总结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道理，而在当今时代，以党史为鉴就更有其现实意义。

以活生生的党史进行革命的传统教育和党的政策教育，目前正值大好时节，即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此之际，让我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完整地了解党的历史，了解党的优良革命传统，了解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发展轨迹，应该说是一件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编写了这部中共党史青少年读本，旨在对我国的广大青少年进行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使广大青少年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了解党所走过的艰

辛历程，并真正懂得今天的红色江山来之不易，以此来激发广大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真情实感。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虽然才将近90年，但这部历史却是相当厚重的，其中充满了跌宕起伏，也充满了悲壮与惨烈；既饱含着党的政策与策略的成功，同时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挫折与失误。诚然，撰写这样的一部党史并不轻松，这其中难就难在，我们究竟应该将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呈献给我们的青少年，使他们既喜欢这部书，又能从中受到教育，汲取“营养”。在这样一个2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中达到这种目标，这对于我们作者来说，的确有点勉为其难。

难度固然不小，但是在深感其难的同时，也还觉得应该大胆一试。党在这近90年的历史中，虽然也有一些曲折失误，但与曲折失误相伴而行的仍是闪光的亮点。党所走过的历程，所创造的业绩，值得着墨之处颇多，可谓是业绩颇丰，辉煌几度。这其中略择其盈大者即足可使青少年受到浓郁的革命传统教育。

当然，写这样一部中共党史，绝不可以随便胡诌、无原则落笔的，也就是说，写这样的一部历史必须遵循一些原则。本书遵循的原则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既注重革命传统和党的政策与策略，也关注史实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第二，照顾青少年的阅读习惯，既讲清革命道理，也注意历史的生动性与语言的活泼性，使青少年感到可读、爱看。

第三，既全面展现党的历史，又不泛泛而谈，而是突出那些带有启迪意义的事件和情节，合理处理详与略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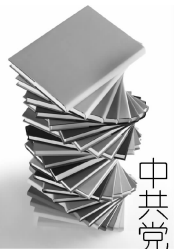
第四，以党的创业历程为主线，展现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

第五，重点描述党史上的“五大辉煌”，同时也对党所经历的挫折与失误作出正确总结，讲清革命的道理，给青少年一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艰辛努力就没有美好的社会主义今天”的完整概念。

本着上述的原则精神，我们写出了这部图文并茂、短小精悍的中共党史，但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我们诚恳地期

待广大青少年读者批评指正。

这本仅近 20 万字的小部头党史，共由两人负责撰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的张树军研究员撰写民主革命部分，第三研究部的武国友研究员撰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部分。



中共党史青少年读本

目 录

· 中 · 共 · 党 · 史 · 青 · 少 · 年 · 读 · 本 ·

一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近代中国出路何在	001
走俄国人的路	006
开天辟地	012
最初的斗争	014

二 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国共携手	018
开创新局面	021
在大革命高潮中	024
北伐战争的号角	027
浴血悲歌	029

三 掀起土地革命战争风暴

点燃武装星火	034
独特的道路	038
遭受严重挫折	041

四 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

唤起民众救亡图存	052
到敌人后方去	055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	061

战胜严重困难	066
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	069
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071

五 将革命进行到底

争取和平民主	075
奋起自卫	080
第二条战线	083
转入战略进攻	084
伟大的战略决战	089
绘制新中国的蓝图	092

六 开创社会主义全新事业

“一张白纸” 奠新基	097
边打、边稳、边建	099
过渡时期总路线	103
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	105
步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106

七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108
社会主义社会也难免有矛盾	109
探索艰辛亦曲折	111
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全面调整	114
滑向阶级斗争的历史误区	117

八 “十年”磨难与抗争

狂风骤起	120
所谓的“一月革命”与二月抗争	122
林彪集团折戟沉沙	124
乍暖还寒，周、邓纠“左”的努力受挫	125
铲除“四害”，结束“文革”	128



九	徘徊前进与伟大转折	
	“两个凡是” 与实事求是之争	130
	新的里程碑	132
	拨乱反正与新局面的开创	136
十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之纲领	138
	营造有利的建设环境	141
	平息政治风波，加强治理整顿	144
十一	跨入改革开放新阶段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目标	146
	加强宏观调控， 制定“九五”计划 和2010年远景规划	151
	推进党建和精神文明工作 喜迎港澳胜利回归	154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 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未来	162
十二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与 小康目标总体实现	168
	党的十六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纲领的制定	171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促进科学发展的各项决策	173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77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180
十三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前进	
	党的十七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部署	184

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推进和积极	
应对各种挑战	188
继续推进军队国防建设、外交工作和	
祖国统一大业	192
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197
“十二五”规划的制定	200



一、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21年7月23日晚，茫茫夜色笼罩着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一所寓所里，十几位穿戴各异、口音不同的人正在秘密集会。他们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只有19岁。在淡淡的灯光下，他们的神色显得格外庄重。

这次不同寻常的集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会。那时，对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极其平常的盛夏之夜，但对于悠久远长的中国历史，它却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在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东方古国，要建立一个共产党呢？这个党要担负起什么样的使命呢？就让我们从充满辛酸的近代中国历史开始说起吧。



近代中国出路何在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令世人惊叹不已的灿烂的古代文化。然而，当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陶醉于泱泱大国的“康乾盛世”之时，却万万不曾料到，比“大清帝国”大得多的世界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

变化。

从17世纪中叶开始，世界之舟顺着弯曲的历史长河驶进了近代港湾。18世纪60年代以后，先是英国，然后是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在大约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

翻开这个时期的世界历史画卷，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象：当这些国家的蒸汽机在工厂里轰鸣作响，汽船在内河上劈波斩浪，火车在原野上呼啸奔驰时，曾经创造了古代灿烂文明的中国却依然是刀耕火种、男耕女织。原来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已远远跑在了中国的前面。

历史是无情的。一方生机勃勃，一方苟延残喘，这种反差极大的对比是令人心痛的。为什么中国落伍了呢？是中国人变得愚笨了吗？不！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制度，阻滞了中国历史车轮的前行。由这个制度构架的中国社会，日益走向了衰败和落后。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英国侵略军以坚船利炮和鸦片烟土冲开了中国长矛大刀筑起的海防，耀武扬威地开进了这个闭关锁国的东方古国。自那时起，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每一次的入侵，都使中国山河破碎；每一次的战争，都使中国人民生灵涂炭。屡吃败仗的清朝统治者被迫同西方列强订立了一系列割地、赔款、让权的屈辱的卖国条约。



签订耻辱的《南京条约》

马克思早已精辟地说过：“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

面对着大门洞开的中国这块肥肉，眼看着不断流入腰包的白银，贪婪的外国资本家喜出望外，头脑也发昏了。英国一家公司运来大批刀叉，准备供给习惯于用筷子的中国人进餐之用，结果刀叉在商店里陈列多年，无人问津。英国伦敦一家公司运来大批钢琴，设想在有几亿人口的中国，如果每 200 个妇女中能有一个愿学钢琴，那将是多少大的一笔买卖呀！结果钢琴被堆在仓库里，任凭它受潮变质。这两个近乎荒唐的故事，昭示了外国侵略者对地大物博的中国垂涎已久。他们来中国，不是领略东方古国的风情，更不是传播资本主义文明，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

在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没落面前，外国侵略者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他们在中国强行划分势力范围，不仅取得了在中国设立工厂、开采矿山、修筑铁路、设立银行、经理航运等特权，而且取得了驻扎军队、设立租界、领事裁判等特权。这样，外国侵略者既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也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大权，俨然成了“大清帝国”统治者的太上皇。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维新志士谭嗣同的这首诗，表达了那时四万万中国人的呼号和无奈。

是的，中国人民本来已饱受本国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如今又受到外来侵略势力的掠夺和奴役，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自那时起，近代中国一步步由封建社会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沦落到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境地，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因此，救亡和发展是近代中国的两大问题。

这样，中华民族就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另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把中国建成为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成为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共同关注的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但是，谁来铲除横亘在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几座大山，拯民众于水火，救祖国于危亡呢？

林则徐虎门销烟，魏源幻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力图“求强”、“求富”，严复发出“救亡”的呐喊……地主阶级内部的这一切努力，并不能挽救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大清王朝。



林则徐虎门销烟

中国农民最早成为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斗争的主力。从三元里抗英到太平天国战争，从义和团运动到白朗起义，血与火的抗争，生与死的较量，悲壮且悲愤。然而，农民毕竟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他们不可能提出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纲领。他们的斗争往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不可能组成起领导作用的政党。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斗争最终归于失败的命运。

19 世纪下半叶，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生长起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斗争中崭露头角。康有为、梁启超搞了个“百日维新”，企图在不变动现政权和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积弊修修补补，终因不为统治者所容而流产。“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这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在狱中悲愤的慨叹。它代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难以避免的苍凉结局。



谭嗣同英勇就义

当历史老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蹒跚地进入公元 20 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又不得不蒙受被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依然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暗淡的前景。于是，中国人在进行了各种不成功的反抗之后，只有起来革命一条路了。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 1894 年创立兴中会时，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

1905 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和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纲领，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觉悟到改良无异于与虎谋皮，从而摒弃温文尔雅的改良之途，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纲领。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了。由于这一年是中国的辛亥年，所以由此引发的这场革命被称做“辛亥革命”。1912 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建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从此，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被打乱了，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而为日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 20 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 20 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

那时的中国人着实为辛亥革命的成功而沉醉和狂欢了一阵子，

但是，现实使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大清帝国”的黄龙旗飘落了，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升起了，但封建统治的基础却依然根深蒂固。夹缝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从娘胎里就带着软弱性，他们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土崩瓦解之后，竟然迷惘踌躇，止步不前。于是，南京临时政府昙花一现，统治权转瞬间落到了前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手中。北洋军阀代替了清朝王室，水深火热换成了火热水深。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中国人民依旧在煎熬中痛苦地挣扎。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

辛亥革命最后为什么归于失败呢？究其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严重脱离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这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农民斗争、资产阶级改良甚至资产阶级革命，各种救亡的方案，各种惊心动魄的斗争，都相继画上了痛苦的句号。一次次的反抗都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饮恨黄泉，许多活下来的人仰望苍天。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走俄国人的路

大凡一个民族的彻底觉醒，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这个民族被逼到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旧的格局已无法维持下去，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二是这个民族能从现实中看到新的出路，在心中燃起对未来的热切希望和美好憧憬。

辛亥革命后，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

一方面，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国内军阀割据和混战愈演愈烈；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那时，活剧、

闹剧、丑剧一幕紧接一幕，在中国这个千疮百孔的大舞台上演出着。残酷的现实使中国人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

另一方面，旧的路已被证明是走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一个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也在苦苦思索着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寻找着救国救民的新出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之中。而新文化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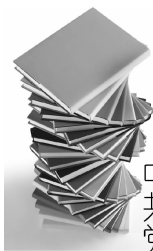
1915年9月，留日归来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它像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风暴。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认定，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没有经过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欲救中国，必先启蒙。他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了全面的挑战。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进步的思想解放潮流。

那时的许多人认为，中国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强盛，就得走西方文明之路。于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用当时的话说，也就是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据陈独秀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科学除指狭义的自然科学外，还指广义的社会科学，强调要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不难看出，初期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仍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信奉的思想武器。

当中国人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奋斗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世人领略了战争的残酷；一件是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阿芙



《新青年》杂志



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宣告了中国的北方邻国——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这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对中国的先进分子的震撼同样是巨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从而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种种怀疑。正是这种怀疑，推动他们去寻找新的挽救中国的思想武器。而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个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的心中重新燃起了新的希望，给中国的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他们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列宁正在进行革命宣传

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18年，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三篇文章，盛赞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这以前，中国已经有人在谈论社会主义，也有人介绍过马克思的名字和某些著作片段，但真正推动社会主义思潮广泛宣传的是1919年发生的两件事。

1919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会议竟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应将在中国胶州湾的租借地、铁路和其他在山东的权益无条件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

来，举国震惊，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5月4日，北京3000余名大中学生在天安门集会，举行游行示威，呼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形成了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从此，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旋即各地工人、商人等起而响应。全国人民的拒签和约运动最终阻止了北京政府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的杰出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

也就是在这年7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权。

巴黎和会与苏俄宣言，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前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愤慨，后者则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惊喜。一些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抱有幻想的人，从这种对比中放弃了原来的迷恋。

当人们从五四运动高潮的兴奋和激动中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于是，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为人所注意，甚至流行一时。但当时是泥沙俱下，鱼龙混

杂，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在报纸杂志上纷然杂陈。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流派，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比较和鉴别，逐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成为中国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抛弃了过去热情宣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于1920年9月发表《谈政治》一文，肯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湖南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人物毛泽东，经过对种种主义的迷惘和探索，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董必武、陈潭秋、杨匏安、向警予、李达、李汉俊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组成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队伍。这以后，在上海和北京形成了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从“隔着纱窗看晓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心路历程。他们殊途同归的选择，是经过慎重思考和反复推求的。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旦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很快就会投入到实际行动中去。这时，中国工人阶级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1919年，全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它同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具有顽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它又比农民更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具有更开阔的眼光。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五四爱国运动中，工人罢工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于是，他们很快就走到工人中去。在长辛店的棚户区，在大上海的陋巷里，都有他们深入工人群众的身影。通过先进知识分子这个桥梁，就把诞生在遥远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连接起来了。

有了先进的理论，有了新的社会力量，当时，在中国建立一个

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开天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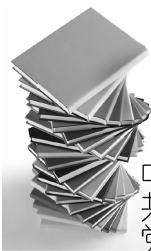
1920年2月，一辆骡车驶出了寒冷的北京城，车上的两个人一副商人装扮。这两个人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为帮助陈独秀摆脱北京政府的迫害，李大钊护送他先到自己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暂避，然后再转道天津前往上海。就是在这辆骡车上，两位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一路赶车，一路交谈，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南北呼应，组织建党。

原来同是新民学会会员的蔡和森和毛泽东也在讨论建党的问题。1920年八九月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几次写信给在国内的挚友毛泽东，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共产党”。毛泽东完全赞同他的意见，表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这些情况表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这也是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要求。

与此同时，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也在帮助中国建党。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他们的建党工作给予帮助。

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但它们的性质相同，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党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0月，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等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任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的



共产主义小组也先后成立。在日本、法国也建立了由中国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一步深入工人群众。一批工人先进分子也迅速成长起来。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达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小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陈公博；旅日小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

从7月23日开始，一大在上海代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进行。7月30日，因会场突遭巡捕搜查，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中国共产党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根本目的，在中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大会还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运动。大会最后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推选陈独秀为书记。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正式宣告成立了。



嘉兴南湖游船

曾经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后来说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事实确实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中国大地上点燃。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全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还是一个仅仅拥有 50 多名党员的很小的党，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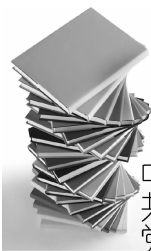
最初的斗争

在党派林立、社团丛生的 20 世纪初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航船有了新的舵手。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党的一大以后，最初的工作是按照一大的决议，首先以主要力量从事工人运动。1921 年 8 月，党在上海领导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1922 年 1 月，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到 3 月形成香港工人同盟总罢工，罢工人数达 10 多万人，迫使港英当局同意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5 月 1 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

在工人运动中，党注意发展党员，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同时，党也积极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2 年 5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

党成立后一年间的风云变幻，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中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观察和认识。在中国，革命的敌



人首先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只有先经过打倒这两大敌人的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过程互相衔接，但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必须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

列宁和共产国际又一次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很大帮助。1922年1月，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提出被压迫民族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任务。

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是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大会发表的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现状，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既描绘了革命的远景蓝图，又明确了革命的近期目标。



位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

纲领就是旗帜，纲领就是号召。二大后，党继续领导工人运动向前推进。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的工人斗争，在1922年下半年风起云涌，走向新的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湖南区、武汉区和北方区的工人运动尤其引人注目。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区委特别重视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毛泽东数次到安源调查，并派李立三、刘少奇等到安源具体领导。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我们不是牛马，我们要做人”的口号响彻这里的山山水水。与此同时，北方地区开滦煤矿和上海、武汉等地的工人运动也迅速发展，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京汉铁路的工人更是走在前列，把这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向了顶点。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北洋军阀的极端恐惧。军阀吴佩孚下令反动军警抢占京汉铁路总工会会址。2月4日，愤怒的2万多工人举行总罢工。2月7日，吴佩孚调集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实行镇压，造成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据统计，在这次惨案中，工人中牺牲者50人，受伤者300余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流亡者1000余人。

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次罢工斗争中，表现出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军阀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连砍数刀，逼他下令复工，他宁死不屈，坚定地回答：“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最后他壮烈牺牲。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在牺牲前仍高呼“劳工万岁”。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国



林祥谦

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暂时走向了低潮。然而，工人阶级的热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尽管中国共产党这时还处于幼年，但任何敌人都已无法压倒它。最初的斗争虽然遇到了挫折，但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悲叹，而是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于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带着这些经验教训，昂首挺胸去迎接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浪潮的到来。

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列强，除军阀。……”这首在 20 世纪 20 年代流行一时的歌曲，曾经激动过多少人的心，曾经鼓舞过多少人投身革命。如今，那段历史已离我们远去，但是，那歌声仿佛仍在山涧云霄回荡，在后来人的心中回荡，把我们带回到那激动人心的年代。

1924 年至 1927 年，一场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运动，似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或“国民革命”。这场大革命是当时的两大革命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携手合作结出的硕果。



国共携手

打倒列强，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除军阀，就是要铲除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为什么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会出现这样一场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看一看 20 年代初中国的境况。

这时，两个突出的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一个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危机之后，卷土重来，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中国社会大多数人都直接感受到了来自列强的压

力，反帝情绪普遍高涨；一个是受列强操纵的国内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尤其是直系、皖系、奉系三大军阀派系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导致军费激增，人民困苦不堪，激起社会各阶层变革现状的强烈要求。

一场革命运动的兴起，仅有客观的革命形势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足以领导人们投身革命的力量和鼓舞人们前进的希望。而这种条件，到20年代中期已经具备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时的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还很小，但它提出了明确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并为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对于建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目标是异常艰难的。“二七”惨案的教训告诉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必须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各革命阶级、党派和革命力量的联合战线，尤其要唤醒工农群众，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积极地联合在中国南方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也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鼓励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

此时，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经日趋腐败，要革命必须改弦易辙，因而也对国共合作抱有极大兴趣。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合作事宜。孙中山也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告诉他，自己是共产党员。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孙中山这位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能够邀请一个人数如此之少、成立只有一年的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共产党已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国共合作是经过两个重要会议得以实现的。

第一个会议是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中国共产党有党员420人。中共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规定，国共合作后，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

自己的独立性。

中共三大确定的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合作形式。当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不久，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在共产党人和苏联代表的帮助下，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第二个会议是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出席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会场旧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 10 人当选，约占总数的 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开创新局面

1924 年的广州，到处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革命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国民革命的影响从中国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各种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很快开创出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民党一大后，各地的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对于两党合作，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他们满腔热情，积极帮助国民党，在很多省市建立了地方组织。到 1926 年国民党二大时，除新疆、云南、贵州等少数地区外，都已建立了国民党的地方组织。李大钊、董必武、林伯渠、何叔衡、宣中华、侯绍裘等共产党员还担任了国民党省市党部的负责人。

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可靠的军队。于是，就有了黄埔军校这所对今天的人来说也并不陌生的陆军军官学校。创办一所军校，是共产国际代表提议的。一贯重视军事工作的孙中山，从长期依靠旧军队进行革命而屡遭失败的痛苦教训中，也深感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十分重要。国民党一大正式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1924 年 5 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任命曾被派往苏联考察的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布留赫尔（在中国化名加伦）等苏联红军将领为军事顾问。苏联还给了 200 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并运来了 8 000 支步枪和 500 万发子弹。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6月16日，是孙中山没齿不忘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他所依靠的军阀陈炯明炮击大元帅府，叛变革命。两年后，孙中山选择这个日子举行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其用意正如他在演说中所说：“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是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改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黄埔军校旧址

黄埔军校与旧式军校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的学员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学生总数的1/10。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许多将领就是从这里开始其军事生涯的。像赫赫有名的徐向前、陈赓、左权、蔡申熙、许继慎、蒋先云等都是第一期的学员。

国民党改组后，成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工人部部长廖仲恺因身兼数职而无暇主持工人部工作，实际工作由工人部秘书、共产党员冯菊坡负责。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秘书彭湃，也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工作，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1924年7月，在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斗争持续一个多月，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吹响了工人阶级从“二七”大罢工的挫折中奋起的号角。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以共产党员林伟民、刘少奇为正副委员长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的组织。

同样是在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班。这所农讲所是经共产党人提议而创办的，先后办了六期，分别由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他们从这里奔赴各地，在广大农村点燃革命的火种。千万农民从沉睡中被唤醒，集合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中。

有了焕然一新的革命政党，有了朝气蓬勃的革命武装，有了从挫折中奋起的工人，有了从沉睡中觉醒的农民，革命的洪流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于是，在中国南部，逐渐汇成了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北方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等于1924年6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冯自由也写信给孙中山，指责他偏袒共产党人，遭到孙中山的严厉斥责。由于孙中山享有的崇高威望和维护国共合作的坚决态度，使得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有所收敛。这场斗争虽然暂时平息了，但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为回答面临的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时中国共产党有党员994人。中共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大会对如何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这些弱点在以后的革命运动发展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中共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病在北京逝世。他在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家在总结自己毕生的政治经验之后得出的根本结论。孙中山的去世，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



在大革命高潮中

1925年5月15日，对上海内外棉七厂的工人来说，是一个黑暗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厂主宣布停工。该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多人，顾正红身中四枪，壮烈牺牲。

日本资本家的暴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怒。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于5月30日发动学生和工人到租界内举行示威活动。

5月30日，对上海人民来说，是一个更加黑暗的日子。这一天，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示威活动，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繁华的马路顿时被示威群众的鲜血染红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震惊了上海，震惊了全中国。外国军警竟然在中国的国土上恣意屠杀中国民众，这不能不使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感到耻

辱。上海人民率先奋起，从6月1日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冲破了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以磅礴的气势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

这是火热的时代。6月4日，由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正式发行了。瞿秋白主笔的发刊词写道：“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



“五卅惨案”烈士顾正红

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这充满激情的呐喊，鼓舞着人民投身反对帝国主义的洪流。人们长期郁积心中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和愤怒，经过“五卅惨案”的触发，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决心以热的血向冷的铁挑战。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狂飙迅速席卷全国。近一两个星期里，各地就有600多个城镇、约1700万群众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穷乡僻壤，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和国际友人纷纷举行集会，发起募捐，给国内的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援。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了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的省港大罢工。6月19日，香港工人开始罢工，15天内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25万人，其中10多万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6月23日，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10万人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突遭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射击，造成死52人、重伤170多人的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并封锁出海口。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之久。10多万有组织的罢工工人，

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10倍，1925年底达到1万人，并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党组织。

这是风起云涌的年代。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25年4月，东征军取得了讨伐盘踞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的胜利。5月，平息了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在广州发动的叛乱。随后，进行了改组广州政府和改编军队的工作。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在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朱克靖、罗汉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9月，国民政府再次举行东征，11月底取得全歼陈炯明余部的胜利。同时举行南征，消灭了盘踞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邓本殷部。至此，广东全省获得统一，为举行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国民革命终于吹响了向着胜利进军的号角。

伴随着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一股由国民党新老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迎面袭来了。两股力量交汇，国共两党关系处在一个个历史的旋涡之中。

1926年3月，日益走上反共道路的蒋介石突然采取了旨在打击共产党的行动。3月18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接到命令，要他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立刻谣言蜂起，说李之龙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戒严，逮捕李之龙，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所谓的“中山舰事件”。

中国共产党对这个突发事件毫无准备，也缺乏应对的经验。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主张妥协退让，结果使得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同时迫使汪精卫称病去职，从而为蒋介石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二大和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的退让，使右派在

国民党中央占据了优势地位，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变得毫无地位。蒋介石先是攫取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的职务，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其权势迅速膨胀。

这时，已到了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北伐战争的号角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部作为北伐的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北伐先锋，锐不可当，拉开了气势如虹的北伐战争的序幕。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占据湖南、湖北一带的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占据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部，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的自成一派的原直系军阀孙传芳部。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军长驱直入，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席卷江南半壁河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从珠江唱到了长江。9月6日、7日，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先攀登城头，其他各部相继入城，全歼吴佩孚部主力。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屡破强敌，英勇善战，它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



叶挺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后，江西战场的国民革命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先后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中国南部各省。冯玉祥部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从一开始就取得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的歌声从城市传到山乡。在共产党人的发动和组织下，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带路、送信、侦查、运输、扫雷、慰劳、担架救护、扰乱敌军后方等任务，并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给了北伐军以巨大的支援。

工农群众支援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空前高涨。

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处处燃起农民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阶层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毛泽东曾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赞誉道：“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在城市，工人运动也迅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建立了总工会，并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大都取得了胜利。群众性的反帝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1927年1月，武汉的工人和其他市民在共产党员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国民革命军也接管了九江英租界。2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国方面签订协定，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英勇的上海工人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先后三次举行武装起义。第三次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于3月21日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

在南方几省掀起革命风暴的同时，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在继

续发展。这样，就形成了几乎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汇合成工农兵联合作战的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是国共合作结出的硕果。在北伐过程中，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支援也起了重要作用。



浴血悲歌

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并不能掩盖和遏制潜在的暗流，南方革命阵营的分裂开始明朗化了。

随着北伐战局的发展，蒋介石进一步加紧了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认定他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使他的实力迅速膨胀。同时，一批批政客、官僚投靠到蒋介石的身边。所以，当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早已下定反共决心的蒋介石迫不及待了。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发表反共演讲，并开始镇压工农革命力量。随后，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发生了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的严重事件。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会后，右倾投降主义的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蒋介石在选择对共产党下毒手的时机。1927年3月下旬，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已被工人起义占领的上海。3月24日，国民革命军一部占领南京。到这时，蒋介石认为等待已久的时机到了。4月初，他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经过精心的密谋和准备，终于背叛革命，在上海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这天凌晨，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向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国民革

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进行调解为名，强迫工人纠察队缴械。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10万人召开大会，会后整队游行。第二十六军从宝山路的埋伏处突然向人群扫射，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逮捕的共产党员

北方的天空骤然间也变得乌云翻滚。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把李大钊送上了绞刑架。这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神色不变，从容就死”。早年，李大钊曾在一篇名为《牺牲》的文章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

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李大钊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

反动派南北呼应，联合起来绞杀革命。一时间，黑云压境，血雨腥风，中国的大革命到了危急关头。



就义前的李大钊（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仍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刚到武汉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汪精卫一派国民党人合作，所面临的斗争任务更加复杂。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这时党员人数已近5.8万人。这次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只能坐视局势继续恶化。



党的五大闭幕后，反共事件接连发生，武汉这个革命的大本营已成风雨危楼。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缺乏信心，继续执行退让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了3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力量过于强大，革命力量相对弱小，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主观上，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种错误，与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直接关系，也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所难以避免的。

这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它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千百万工农群众在斗争中经受了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所有这一切，为领导中国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三、掀起土地革命战争风暴

1927年8月1日凌晨，江西南昌。

武装起义的枪声划破了这座城市寂静的夜空。这枪声，宣告了一个新的时期的到来。

从那时起，昔日的盟友——国共两党展开了持续十年的内战。史称这个时期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应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为止，为了叙述方便，这一章只写到红军长征结束，而把日本入侵中国以后的历史放到下一章中去集中叙述）。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要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斗争呢？后来，毛泽东用通俗的语言说明了这个简单的道理。他说：“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毛泽东说的是实情。下面就让我们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看一看革命的星火是怎样成为燎原之势的。



点燃武装星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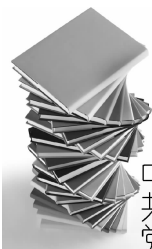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一度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大革命时期受到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党的活动家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相继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夏明翰在绝命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郭亮在牺牲前夕写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共产主义的事业必定会胜利。



周文雍夫妇在狱中合影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它成立以来不曾遇到过的严峻考验。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员的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党的组织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工农运动走向低谷。一时间，人们曾经有过的几多希冀、几番梦想似乎破灭了，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不知何去何从。相当多的中间人士也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无情地证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在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暗淡的时刻，坚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着革命的旗帜。贺龙、彭德怀、叶剑英、徐特立等一批革命者，恰恰是在这危难的时刻，义无反顾地参加到党的行列里来。他们重新集合在党的旗帜之下，投身到新的革命风暴中去。

10多年后，毛泽东回顾这个时刻，说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要继续革命，下一步怎么走？大革命失败的严酷现实向共产党人昭示：赤手空拳，只能坐以待毙，要革命，只有浴血抗争。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中共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举行起义，占领了南昌城。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



八一南昌起义

败。这次起义的教训是没有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这种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向世人宣告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新中国的十大开国元帅中，有 7 人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们是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和林彪。8 月 1 日，成为一代又一代军人深情回瞻的时刻，成为人民军队光荣诞生的纪念日。

南昌起义爆发后的第七天，即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后来发展成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共产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这是多么珍贵的真知灼见啊！



八七会议旧址

八七会议为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成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八七会议后，新选出的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不久，各地群雄四起，武装斗争的星火燃遍大江南北。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按照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写下的这首《西江月》，是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一壮举的礼赞。

参加这次起义的共计约 5 000 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总指挥。这次起义于 9 月 9 日发动，在夺取长沙遭受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9 月 19 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再图发展。当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10 月 7 日，毛泽东率部到达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硝烟未尽，广州又燃起了暴动的烈火。12 月 11 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并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由张太雷代理）的广州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起义在第三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战士英勇牺牲。这次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它的失败再一次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嚣张，革命力量浴血抗争。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那时三次规模较大的起义，除此之外，到 1928 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在其他地区先后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表明，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血与火的语言，演出了一场场悲壮的历史活剧。这些起义虽然有一部分迅速失败，但有一部分在数省边界、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农村地区坚持下来，为后来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尽管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革命依然处在低潮。然而，1927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却没有

正确地认识这种形势，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盲目地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暴动，革命力量遭受了惨痛的损失。1928年4月，中央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为什么明明革命已进入低潮，而中国共产党内却会出现这种“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呢？这是由于许多共产党人还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足够经验。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愤恨和复仇的渴望，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憎恶，像一团烈火，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产生一种冲动，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种“左”倾情绪，在当时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历史现象。

“左”倾盲动造成的失败提醒全党，应当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任务。于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异国他乡召开了。

苏联莫斯科，是那时全世界共产党人向往的圣地。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别墅举行。这时中国共产党有党员4万多人。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六大正确地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这些都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结论。尽管六大还存在着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把民族资产阶级看做革命的敌人等缺点，但大会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独特的道路

中共六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朱德正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党的六大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革

命从城市转到农村，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条路怎样走，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探索。在这方面，毛泽东、朱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胜利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井冈山地处湖南、江西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崇山峻岭，林木茂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由于离中心城市较远，国民党在这里的统治势力比较弱。初到这里时，毛泽东抓住时机，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并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初步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湘南起义的部队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这便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不久，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随后，红四军接连击破敌军三次“进剿”，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在作战中，逐步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稳定，从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了全面分田的高潮。



井冈山会师

1928年10月，湘赣边界举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决议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指明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和经验。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对它们进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它们就会走向反面。毛泽东是自觉

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同旧式的农民战争加以区别的。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不仅为各地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1928年7月间，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义，组成工农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不久，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进攻，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

赣南地区山峦起伏，地域宽广，物产比较丰富。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由彭德怀等率领的红五军主力会合。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成立。赣南、闽西根据地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对于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认识上存在分歧是难以避免的。在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红四军领导者之间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中共中央在得到报告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九月来信”。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各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明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如何将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古田会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1930年6月，赣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红军第一军团共有两万余人，成为当时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在赣南和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

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真正出现了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有力地支持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除赣南、闽西根据地外，这一时期重要的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共计6.2万多人。

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地下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29年6月，党员数量由六大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6.9万人。到1930年3月又发展到10万人。

这样，在中共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出现了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经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又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自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革命仍能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走向农村，紧紧地依靠农民，勇敢地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各项建设，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开辟出来的。它是全党集体探索的结果，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突出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的最完整的经验，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作了说明。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条独特的道路走向胜利的。



遭受严重挫折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

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和红军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30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24日至28日，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全会前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开始得到纠正，整个工作逐步地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不久，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坐镇和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王明在会上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前往中央根据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博古总负责。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构或新的领导干部，前往各根据地贯彻中央的政策，开展“反右倾”斗争。在中央各项“左”倾政策尚未贯彻到各根据地时，红军仍取得了多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刻掉转枪口，集中重兵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了“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了重大胜利。红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一次次粉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其根本原因在于红军得到了在土地革命中获得利益的广大贫苦农民的大力支持，同时反“围剿”的胜利也是与毛泽东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分不开的。

就在蒋介石集中精力对付红军的时候，一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件突然发生了。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

在日本以武力打进中国本土这个事实面前，中共临时中央并没有正确认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继续推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

“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遭受严重损失，变得更加困难。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团结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仍通过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传播进步思想，并创作出大量进步的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化艺术作品。左翼文化运动对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进程、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作出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逐步地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央根据地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

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后，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旧址

1932年夏，蒋介石调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重兵压境的形势下，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对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毛泽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后，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将其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随后，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当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时，中共临时中央难以再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根据地。此后，临时中央开始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为了排除障碍，临时中央在福建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唯俊）、古（古柏）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矛

头直指毛泽东及其一系列正确主张。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已有8万多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完全不懂中国情况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军事指挥，结果使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修筑工事坚守广昌。经过18天血战，广昌失守。

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已估计到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已无可能，遂秘密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为调动和牵制敌人，7月，红七军团奉命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他们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会合后，成立红十军团，继续分两路北上。在国民党军队重兵追堵下，终因众寡悬殊，在1935年1月失败，方志敏被俘。从被俘到牺牲的短短六个多月中，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的篇章。他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化成了血铸的十几万文字，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如虹浩歌。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从容就义，把一腔热血毫无保留地洒在了他深爱的祖国土地上。



方志敏

同样是在7月，红六军团也奉命撤离湘赣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西进到黔东南地区，10月下旬同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



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11月，红二十五军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

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在8个省的15个地区独立地坚持了3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留下来的瞿秋白、何叔衡、阮啸仙、刘伯坚等重要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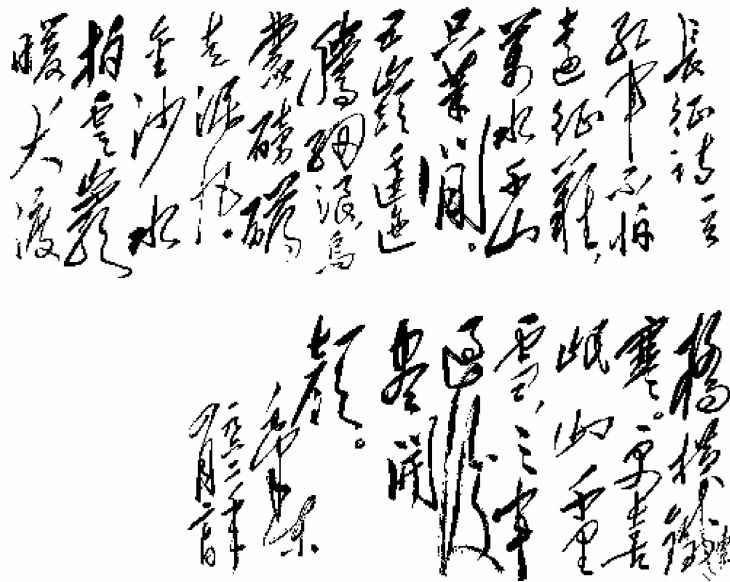
瞿秋白，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从青年时期就立志“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为了使中国人民走上光明的路，他以重病之躯，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尤其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他肩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作出了重要贡献。被俘后，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行刑之前，他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他的英名，将永留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瞿秋白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的这首

《七律·长征》如今已家喻户晓。它以磅礴的气势，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万里长征这一气壮山河的壮举。



《七律·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在开始时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四道国民党军队布下的封锁线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红军内部明显地滋长起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事实的教育下逐步改变了态度。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等候红军的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红军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934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攻克遵义。

遵义这座黔北重镇，因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而

闻名于世。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辩，会上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认为博古所作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并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原址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四渡赤水，迂回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随后继续北上，通过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6月12日，先头部队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

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使集结在懋功地区的兵力达到10多万人。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决定，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

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两河口会议结束不久，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提出了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同时，他还谋取了红军总政委的职位。8月3日，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8月下旬，右路军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后，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仍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后，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随后的几天中，中共中央多次电令张国焘率部北上，他仍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月17日，陕甘支队先锋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由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会师。10月19日，部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2.5万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终于胜利结束。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张国焘于9月下旬指挥原左路军和右路军一部重过草地南下。10月5日，他公然另立“中央”。中共中央在1936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南下红军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4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仍一再来电，催促红四方面军北上。同时，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来，从莫斯科回国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另立的“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在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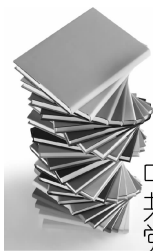
红军长征路线图

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许多指战员的支持，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陕甘地区胜利会师。

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2.18万人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过河部队称西路军。西路军孤军奋战4个多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而以失败告终。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意义。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会师，这个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四、 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

如今，这首雄壮的歌曲已成为象征中国人自豪和尊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然而，就是它，这首诞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义勇军进行曲》，喊出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满腔的悲愤，唱出了那个时代中华儿女不屈的心声。

历史资料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一个英国记者在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了，不觉心神震动；这歌曲曾流行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国人的踪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

就让我们循着这首歌的旋律，回到那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看一看中华民族是怎样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



唤起民众救亡图存

1931年9月18日，一件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突然在沈阳发生了。

这天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事端。3月9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宣布成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的伪满洲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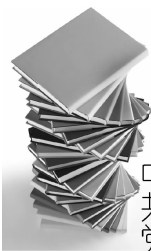
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本土，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不顾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仍把求和作为基本方针。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并没有满足日本侵略者无止境的欲望。到1935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的争夺，制造了被称为“华北事变”的一系列事件，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

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忍无可忍的北平学生在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遭到军警的殴打和水龙喷射。

“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郁积在心中的悲愤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了。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人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

“一二·九”运动成为中华民族觉醒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它的出现表明，此时的中国已处在政治大变动的前夜。



当华北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候，中共中央和红军正在长征路上。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10月1日在国外公开发表。

结束万里长征的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刚刚站住脚跟，便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中国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

中国共产党采取切实措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推进“一二·九”运动后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在西北地区，对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华北事变后，受到威胁的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开始考虑调整对日政策。从1935年底开始，南京政府还试图得到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此后，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两党高层之间中断8年多的联系逐渐接通。中国共产党为了表明诚意，5月初，将东征红军全部撤回黄河以西，并发出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郑重地向国民党表示愿意同它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动。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1936年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2月4日到达西安，逼迫

张学良、杨虎城率全部军队开赴陕北前线“剿共”，西北地区上空战云密布。张、杨连续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蒋的严词训斥。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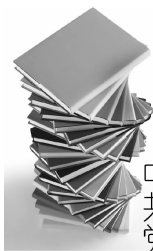
张学良

杨虎城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陈诚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夜，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在经过认真研究后，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对西安事变应如何解决，中共中央在弄清情况后认为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都希望事变和平解决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经过两天商谈，宋美龄等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又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



关系迅速发展。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此后，延安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准备。

中国共产党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尽管局势发展中还有跌宕起伏，但团结抗日的历史潮流已经不可逆转。



到敌人后方去

1937年7月7日，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标志性的日子。

这天晚上，日本军队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举行实弹演习。他们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和遭到“非法射击”，提出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和中国守军必须撤出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了。



卢沟桥

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日军在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以30万兵力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8月13日，又把战火烧到了上海。他们自恃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以为能够在短期内轻而易举地迫使中国屈服。

亡国的严重危机摆在中国人面前。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7月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在庐山同蒋介石等继续谈判。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7年8月，国共双方达成将在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第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编制4.5万多人。1937年9月，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

9月22日，在中共的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形成。

盼望已久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实现了，全国人民不能不为之激动万分。《呐喊》创刊号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达了当时人们的心情：



八路军肩章

“期待了六年了，这伟大的抗战现在毕竟展开在我们的眼前！看着飞机在天空翱翔，听着大炮在耳边轰响，我满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的喜悦使我快要发狂。”

在那些日子里，中华民族蕴藏着的巨大力量迸发出来，人们以各种方式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都纷纷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资本家踊跃购买救国公债，为前线捐赠钱物，积极组织厂商内迁。华侨纷纷建立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筹集现款物资，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形成了，但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和两种不同的军事战略方针。

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日军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国民党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曾先后进行平津、淞沪、忻口、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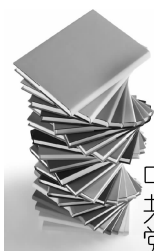
仅1年零3个月的时间，日军即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夺取了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大片领土。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手段极其残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在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30多万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使整个南京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以小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9月25日，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太原失陷后，华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国民党军队从前线撤退下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则向日军占领地区大踏步地挺进，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



敌后游击战争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1937年11月中旬，八路军三个师和山西新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实行战略展开。他们同地方党组织相结合，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召开，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的时候，国共两党于1937年10月在南京达成协议，将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万人。新四军成立后，陈毅、粟裕等部相继进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

随着敌后战场的开辟，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这时，“速胜论”甚嚣尘上，与此同时，“亡国论”仍有相当大的市场。为了系统回答这次中日战争的规律和前途，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这部鸿篇巨制。

《论持久战》分析了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明确得出结论：中国不能速胜，但中国不会亡国，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论持久战》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了抗日战争发展全过程的蓝图，回答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按照持久战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先后创建了华北的晋察冀、晋西北、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的苏

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

敌后游击战争最初是依托山区进行的。1938年冬，中共中央又作出战略决策：原山区的八路军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各部也利用山区和河湖港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等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更加活跃起来，汉、满、朝鲜各民族的抗日战士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总后方是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由林伯渠任主席。这个总后方的巩固和建设，使中共中央能够顺利地指挥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战争。面对强大的日军，人民军队只有简陋的武器装备，没有来自后方的枪支弹药的接济；他们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地区，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然而，他们与当地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敌后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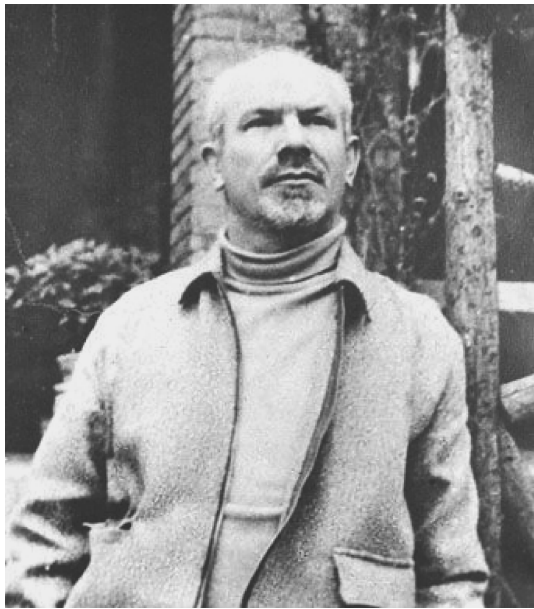
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先后成立了驻南京、武汉等地的办事处。中共主办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相继在汉口公开出版。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政治部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人从原来比较狭小的环境中走出来，得以同国民党统治区社会各界公开接触，广交朋友，开诚合作；还结识了不少国际友人，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同情。著名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等便是在这时经武汉前往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

国共合作虽然实现了，但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关系，成为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

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

自主原则。然而，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国后，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抹煞国共两党的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这次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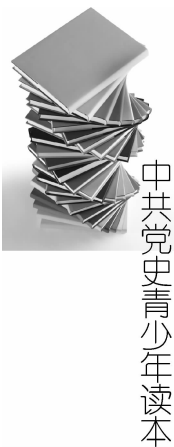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战略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国民党政府，则从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其占领区内，则加紧扶植汉奸傀儡政权。

这时，欧洲上空战云密布。英国、美国为了应付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挑起的战争，在东方力求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因此也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劝降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在1938年12月公开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虽然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各地的反共摩擦日趋严重，接连发生袭击和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或后方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甚至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

面对着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口号，并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武装进攻予以还击。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以晋西事变为主的一系列反共武装摩擦事件。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坚决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武装反共事件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迎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1939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明确地阐明了共产党的观点，使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了明确而完整的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中共中央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对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有了重大的发展，创造性地确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策略原则，如“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等。这些策略原则，保证了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能够更加成熟而恰当地处

理各种棘手的问题，不断取得成功。

1940年9月中旬，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制造摩擦，调动主力向位于苏北的新四军重要基地黄桥进逼，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10月4日至6日反击韩部的进攻，消灭韩军1.1万人。



黄桥战役纪念馆

黄桥战役后不久，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血战7昼夜，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内战阴云密布。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中共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1941年1月28日，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全军改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坚持在长江南北开展抗日斗争。同时，中共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并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

共产党这种仍把民族斗争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得到人民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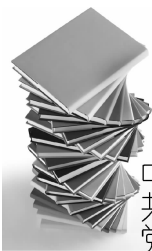
千古奇冤
江為一案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周恩來

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词

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在极端孤立的处境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1941年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于5月8日发出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依然坚持开展工作，并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根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由此大为提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的同时，仍肩负着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筑起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从1938年冬到1940年两年多的时间里，敌后游击战争在广大地区内积小胜为大胜，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根据地，即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



东江、琼崖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拥有1亿人口，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作战。陆续参战的部队达到100多个团，20余万人，被称为百团大战。大战中，八路军官兵英勇杀敌，截至12月5日，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0多人、伪军1.8万人，缴获一批枪炮和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1.7万人，中毒2万余人。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百团大战既锻炼了人民军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又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的民心。



百团大战时的彭德怀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实行了“三三制”、减租减息

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借以调动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美国驻华记者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写道：“在具有远见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们被新的责任所激发出来的才干虽然还不完备，但却正得到巧妙的发展。”

美国记者的话是对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各方面建设，使落后的农村根据地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大大增强了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从而造成了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先进的巩固的阵地。这对于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敌后抗战直到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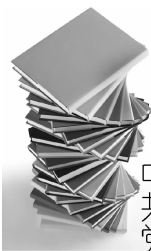
战胜严重困难

抗日战争进行到 1941 年至 1942 年，敌后抗战进入到最困难的时期。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对苏联发动大规模的闪电式进攻，苏联人民开始进行英勇的卫国战争。同年 12 月 8 日凌晨（东京时间），日本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日本和美、英等国之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 年 1 月 1 日，美、英、苏、中等 26 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这时，中国仍然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1941 年底，日本总兵力扩大到 240 余万人，其中 130 万人（包括关东军）压在中国战场上。使日军主力陷在中国战场上，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承认这一点。他曾对自己的儿子说过这样一段话：“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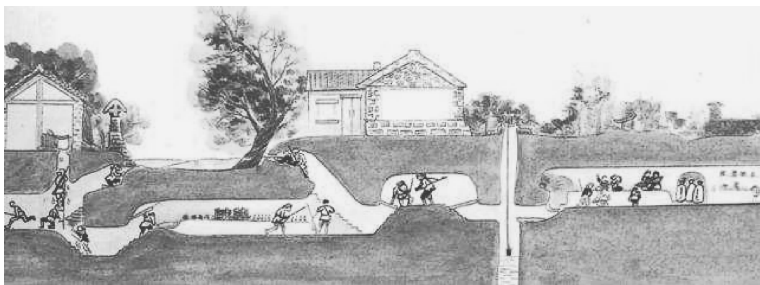
日本为把中国变成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占领区内残酷地实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集中日、伪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1941 年至 1942 年，在“扫荡”华北的根据地时，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 132 次，万人



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在反复的“扫荡”中，日军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进行毒气战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日军对华中敌后根据地也发动大规模进攻，并以苏中、苏南为重点，反复进行“清乡”。

在日军残酷的进攻中，敌后军民遭受重大伤亡。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日军大肆破坏和毁灭中国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造成敌后抗日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时，国民党政府不仅继续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剧了经济困难。

面对遇到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抗战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困难，强调发扬革命精神，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地道战

针对日军对敌后的疯狂进攻，中共中央提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中，

敌后军民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武装工作队等等，使日、伪军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斗争，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

敌后军民在抗战中英勇顽强，作出了巨大的奉献，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8月1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英勇善战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数人被当场杀死，许多人被严刑拷打，却没有人告密。马本斋的母亲不忍群众被打杀，自己挺身而出。敌人对她威胁利诱，要她写信劝儿

子投降。马母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绝食而死。1941年9月25日，在冀西易水河畔的狼牙山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连续打退日军四次冲锋。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其中3人坠落崖底，壮烈牺牲，2人被挂在树枝上，后来脱险。人们赞誉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不幸中弹殉国。抗日英烈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狼牙山五壮士

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中共中央采取了精



中共党史青少年读本

兵简政等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各抗日根据地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41年3月起，王震率第三五九旅陆续开进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使这里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1943年起，各抗日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出一批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



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来到中央党校，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一星期后，他又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

在生机勃勃的延安，在烽火连天的前线，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呢？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成立20多年来，中国革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对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党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系统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经常存在一些分歧。因而，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端正党的思想路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样，全党整风的条件就成熟了。

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它的

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特别强调进行自我批评。

在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决议》表明，要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样，党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从此，“实事求是”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党的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对后来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1945年4月23日，在春意盎然的季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了。七大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召开的一次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盛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七大整整开了 50 天。出席大会的 547 名正式代表和 208 名候补代表，他们肩负着全党 121 万党员的重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七大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七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全党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

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取得一致的理论基础。

七大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6 月 19 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七大是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党的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史的史册。七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

1945 年，欧洲战场上捷报频传。5 月 2 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5 月 8 日，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美国在太平洋上发起越岛进攻，向日本本土步步逼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敌后抗战在度过 1941 年至 1942 年的困难时期后，进入再发展时期。到 1945 年春，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有 19 块，总面积 95 万平方公里，人口 9 550 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上升到 91 万人，民兵有 220 万人。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战后的问题。为了在战后推行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实现取代日本控制中国的目的，美国将前一时期所采取的赞同国共合作的政策逐渐转变为扶蒋反共的政策。

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气焰，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5 月 5 日至 21 日，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拒绝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选择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坚决而灵活地同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和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进行了斗争。

这时，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倒退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统治区内，特务横行，民怨沸腾，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在日军进攻面前缺乏战斗力。从 1944 年 4 月起，日军为了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向正面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新的战略性进攻。在 8 个月中，国民党军队丢失了豫、湘、桂、粤、闽等省的 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 6 000 多万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给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国民党的腐败、倒退和正面战场的溃败，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团结战斗。在争取民主的斗争空前活跃的形势下，9 月 15 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随后，中国共产党又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共产党的这个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

这时，八路军、新四军完成了 1945 年对日军的夏季攻势作战，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法西斯德国的覆灭，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胜利，中国人民的夏季攻势，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末日的到来。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根据这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秘密协定，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苏联红军从600公里的战线上进入中国东北，大举进攻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根据地对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在反攻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反法西斯国家的胜利而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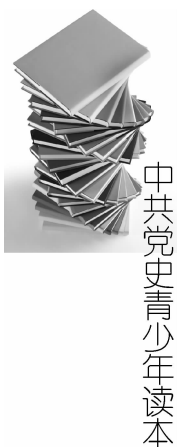
密苏里号受降仪式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极大的代价取得的。据统计，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35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是 100 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雪洗了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 12.5 万余次，消灭日、伪军 171.4 万余人，其中日军 52.7 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 69.4 万余支，各种炮 1 800 余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伤亡 60 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更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大大增加了。党自身也锻炼得更加成熟，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纯熟而恰当地处理种种复杂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逐渐成熟。这一切，为以后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 将革命进行到底

1976年6月中旬，离毛泽东逝世还有不到三个月。他躺在病榻上说起了一生所做的大事。其中一件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几个海岛”，当然指的是台湾及其附近几个小岛。

蒋介石是1949年12月10日黯然离开中国大陆，逃到台湾去的。

时光倒退4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蒋介石是多么神气十足啊！有人甚至把他的大幅画像挂在了北平天安门城楼上。即便是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得意扬扬的呢。那时，仿佛优势都在他那一边。

为什么时隔3年，毛泽东就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他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呢？究其原因，我们可以说出很多很多。如果用一句话简单地概括，那就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这场较量，是民心向背的较量。



争取和平民主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那些天，中国人民沉浸在无比的欢乐和兴奋之中。

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记下了这样的情形：“男人、女人、小孩……所有的人们都走出家门，涌向重庆城内的广场。公共汽车装载着两层乘客，在街道上缓缓而行。一些人站在公共汽车顶篷上欢呼着，挥舞着旗帜。”

聂荣臻这位八路军的将领，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革命圣地延安欢庆胜利的情景：“那些天，延安一片欢腾。宝塔山下，延河两岸，中央机关和延安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之中。”

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一幕啊！对中国人来说，庆祝的是从未有过的盛大节日。

然而，人们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却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还是上面提到的美国记者写道：“第二天黎明，重庆恢复了宁静，狂欢很快就消失了。和平到来了，但是，陈腐的政府、累积的苦难、由来已久的恐惧，所有这些都依然如故。与以往相比，中国不仅没有进行任何改革，而且国内和平变得更加遥远了。”

是的，战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要维持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而共产党则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国共两党对和平、民主、建国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斗争不可避免。

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

蒋介石的内战决心已定，但他也有许多困难和顾忌。在国内，人们热烈地期待着实现和平，建设家园；国际上，英、美、苏等国当时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此外，国民党军队要开赴内战前线也需要一段时间。正在是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接连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是有诚意的。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毛泽东赴重庆这一谋求和平的举动，受到热烈赞誉。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过多次商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了 43 天的就具体问题的谈判。10 月 10 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经过谈判，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重庆谈判的这些结果，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

由于国民党当局执意要取消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在这两个焦点问题上，国共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只得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待继续商谈。

国民党当局虽然同共产党谈判和平，但它并没有放弃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就重新秘密印发 1933 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双十协定”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自日本投降至 10 月 17 日两个月的时间里，有 30 座解放区的城市被国民党军队侵占。

为了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壮大人民革命力量，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一项“全国战略方针”。为贯彻这个方针，中共中央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 11 万人的军队和 2 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并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

国民党军队为了深入华北，打开进军东北的通道，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一路沿平绥路东犯，一路沿津浦路北犯，一路沿同蒲、正大和平汉路向北平推进。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进行反击。先后进行了上党、平绥、津浦、平汉（邯郸）4 个战役，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 14.5 万人，迟滞了他们的行动。

国民党为准备内战，继续将军队调往内战前线。到 1945 年 12 月初，用来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已达 190 万人。

内战阴云笼罩着中国大地，使渴望和平民主的人民群众深感痛苦、忧虑和不满。1945 年 11 月 25 日，昆明 6 000 余名大中学生在西南联合大学（由抗日战争开始后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由于遭到军警的压迫和特务的捣乱，昆明 3 万余名学生举行总罢课。12 月 1 日，大批国民党武装分子冲进西南联大等学校，投掷手榴弹，致使 4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随后，重庆、上海等地爆发声援昆明学生的罢课或游行示威。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基本口号的“一二·一”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进一步处于被动地位。

这时，美国政府宣布调回因公开声明只同蒋介石合作而声名狼藉的驻华大使赫尔利，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杜鲁门总统特使赴华“调停”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 年 1 月 10 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 38 人。会议历时 22 天，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之后，于 1 月 31 日闭幕。政协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虽然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

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中国共产党是准备严格履行这些协议的，而国民党当局从一开始就没有履行这些协议的诚意。政协会议刚刚闭幕，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上，不少国民党要员大哭大闹，说协议不利于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也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不久，他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内战，同美国政府的支持有着直接关系。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国以军用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美国还出动海军陆战队9万多人，进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地，直到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1946年3月，先后组成美国陆军顾问团和海军顾问团。6月17日，签订《中美处置租借物资协定》，将价值5170万美元的军用品交给国民党政府。

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城市后，国民党军队将进攻重点指向东北。1945年11月间，先后攻占人民军队驻守的山海关和锦州等地。1946年3月初，苏联红军按照协议开始从东北的城市和铁路线撤退。国民党军队立刻进驻沈阳，分路向解放区进攻，5月下旬侵占长春，并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1946年5月初，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上海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避免全面内战的发生。但由于蒋介石的内战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成果。

美蒋的倒行逆施，引起广大人民，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严重不安。6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23日，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各界群众10万多人到火车站欢送。当晚，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当局指使的大批暴徒围攻殴打，团长马叙伦等多人受重伤。

事态的发展表明，蒋介石欲发动的全面内战已一触即发。5月21日，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现正积极布置全国内战，我党应积极加以准备，加以制止。在这之前，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以便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革命

和生产积极性，为进行自卫战争奠定更牢固的群众基础。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估计了胜负的各种可能后指出：“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尽管中国共产党作了种种争取和平的努力，然而，内战终于还是爆发了。



奋起自卫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调动22万人，突然向以鄂北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接着，又向苏中、淮北、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国民党的枪口不仅对着共产党，而且对着一切要求和平民主的善良人士。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先后在昆明暗杀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

当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华北解放区的中心张家口后，民盟秘书长梁漱溟脱口对记者说了一句传诵一时的名言：“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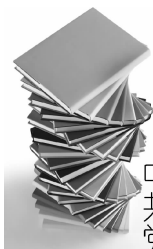


诗人闻一多

是的，和平已经死了。国共两党的和谈以破裂而告终。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离开南京，返回延安。李维汉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

这人心，正是中国共产党在3年多以后战胜国民党的主要法宝。

不是吗？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得意扬扬。他的参谋总长陈诚甚至扬言说：“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



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确实来势汹汹。它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为 160 万人，占其全部正规军约 200 万人的 80%，而且得到美国的援助和支持，装备精良。国民党政府还通过派遣大批官员到日本占领区，贪婪地掠取财物，并通过接收 100 多万日军和几十万伪军的武器装备，收编大量伪军，军事实力也得到进一步膨胀。相比之下，人民军队的总兵力为 127 万人，装备基本上是步兵武器，仅有少量火炮。解放区的人口仅 1.36 亿人，面积约 230 万平方公里，内部的封建势力尚未肃清，后方还不很巩固。解放区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包围中，在物质上得不到任何外援。

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内战的前途到底如何？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否则中国将变成黑暗世界，民族的前途将会被断送；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因为人民军队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战胜国民党的政治基础。

1946 年 8 月，内战刚爆发一个多月，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谈话中，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表示了对貌似强大的敌人的蔑视，表明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

为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战争的发展并没有按照蒋介石、陈诚所列的时间表进行。1946 年 6 月至 1947 年 2 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 70 万人，收复和解放城市 135 座。由于战线延长同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军队终于丧失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能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随之宣告破产。

1946 年 8 月 10 日，马歇尔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实际上宣布“调处”已经“失败”。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的



坚决反对，于11月中旬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并且通过了维护独裁统治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1948年1月，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不久，美国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当局迫使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等返回延安；随后又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及有关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至此，和平谈判之门被国民党当局关闭，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抽调兵力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等指挥下，于2月下旬在莱芜地区全歼南犯之敌5.6万余人。5月中旬，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美械装备的精锐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基本上被粉碎。

在陕北，国民党军队投入胡宗南等部25万人的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进攻。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2万多人，他们在延安以南进行六昼夜的阻击战，掩护中央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后，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在彭德怀指挥下，数战皆捷。到8月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决定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书记处多数成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从1946年7月起至1947年6月止，人民军队在1年的内线作战中，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共歼敌112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发展到190多万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结束战略防御阶段，以新的态势跨入新的阶段。



第二条战线

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在解放区军民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进行内战，进一步投靠美国。驻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1946年12月24日，美国军人在北平东操场强奸一名中国女大学生。这一事件，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即抗暴运动。

12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学生5000余人在北平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沿途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12月31日，中共中央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各大城市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随后，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和示威游行，参加人数达50万人。学生的爱国斗争，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声援。以抗暴运动为标志，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这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内，官僚资本同美国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官僚资本家利用种种政治特权，对广大劳动者进行极度的压榨，对民族资本进行无情的兼并，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萎缩。庞大的军费造成巨额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得不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发出指示，指出党应“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5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5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引发了著名的“五·二〇”运动。同日，北平7000余名学生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走上街头。天

津、上海、杭州、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地爱国学生也通过罢课、游行等方式参加了斗争。除学生运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内其他的人民运动这时也在迅速高涨。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遭到血腥镇压，被害者达3万人以上。1947年，有二十几个大中城市的约320万工人罢工。在农村，农民掀起反抗抓丁、征粮、征税的斗争。

事实表明，与人民为敌，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时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指出的：“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转入战略进攻

战争是变幻莫测的。到1947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刚刚一年，整个战局却悄悄地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

到这时，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而且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虽然数量不及国民党军队，但它士气高昂，并且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战争是智慧的较量。中共中央当机立断，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策：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不等到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立刻转入全国性的反攻。

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选在了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为此，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逐步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三军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

调；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



邓小平与刘伯承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以出乎敌人意料的突然行动，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经过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在8月末胜利到达大别山区。刘邓大军依靠人民群众，奋勇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轮番进攻，到11月，共歼敌3万余人，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

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之际，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人在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

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把战线

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与此同时，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也加紧发起攻击，并渐次转入反攻。

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对此，毛泽东评价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战争又是人力、物力的较量。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它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

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创造出过去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丰功伟绩。

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担负战地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取之不尽的人力、物力的源泉。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有纲领性的文件。

十二月会议以后，中共中央集中全力研究和解决新形势下，党在土地改革、新解放城市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使全党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战争还是民心向背的较量，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



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在1948年也陷于绝境，通货膨胀达到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物价飞涨已似脱缰的野马。用当时清华大学教授吴晗的话说，是“已经到了焦头烂额、山穷水尽的局面”。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危机，在10月发行金圆券来代替原来的法币，但已经无济于事。金圆券迅速贬值，物价涨风更加剧烈，城乡劳动人民遭到洗劫，民族工商业进一步走向破产。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再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广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因而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口号下展开斗争。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灭。

国民党当局不断地用暴力手段对民盟等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宣布解散。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敬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标志着民盟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民主派开始实行革命的联合。1948年1月1日，举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民革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成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开始，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



伟大的战略决战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 1948 年秋季的时候，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的时刻到来了。

到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 280 万人，其中野战军达到 149 万人。解放区面积已占全国总面积的 24.5%，人口有 1.68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35.5%，并且在大约 1 亿人口的地区实现了土地改革。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下降为 365 万人，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 174 万人，而且士气低落。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正确选定战略决战的方向，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战略决战的序幕是从山东拉开的。1948 年 9 月，解放军经过 8 昼夜激战，解放了国民党军队重点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歼敌 10 万多人。

当战略决战开始时，中共中央决定首先把决战方向指向东北战场。从 1948 年 9 月 12 日开始，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解放军主力 70 万人，发起辽沈战役。

9 月 12 日，东北野战军开始攻打锦州，并在塔山、黑山等地区狙击援锦之敌。10 月 14 日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 31 小时激战，全歼守敌近 9 万人。锦州的解放还促使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东北野战军在攻占锦州后，立即从南北两翼合围廖耀湘兵团。经过两日一夜激战，全歼该敌 10 万人。东北野战军乘胜追击，于 11 月 2 日解放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 52 天，歼敌 47.2 万人。从此，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国民党军队有了优势，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东北的解放，不仅使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队，为以后解放平津和华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使解放战争获得了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战略后方。

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共 60 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地区，发起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1948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



淮海战役总前委全体成员（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淮海战役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1 月 6 日至 22 日，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位于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的陇海线上的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11 月 6 日战斗打响后，黄兵团企图夺路西逃。华东野战军主力迅速切断正向徐州靠拢的黄兵团的退路，将敌人压缩在纵横不到 10 公里的包围圈内，到 22 日全歼该敌。第二阶段，从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15 日，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由豫南远道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于 11 月 25 日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地区。12 月 6 日发起总攻，至 15 日全歼该敌。在此期间，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撤离徐州，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合围在陈官庄一带，孙元良兵团被歼灭。第三阶段，从 12 月 15 日至 1949 年 1 月 10 日，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杜聿明部。1949 年 1 月 6 日，解放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经 4 昼夜激战，

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生俘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 66 天，共歼灭国民党军 55.5 万人。经过这一战役，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并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进到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已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

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 100 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1949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3 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统一指挥参战部队。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这时已成“惊弓之鸟”。除有 5 万余人分驻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大同外，其余 50 余万兵力位于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迄平绥路的张家口的约 500 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并以塘沽为海上通道口。傅作义决定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准备随时从海上南逃或西窜绥远。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从 1948 年 11 月 23 日起提前结束休整，取捷径隐蔽入关。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以神速动作，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12 月下旬，连克西头的新保安、张家口。1949 年 1 月 14 日，解放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 29 小时激战，全歼守敌 13 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为了使古都北平免遭破坏，解放军在围城后派出代表多次同傅作义接触。最后，傅作义终于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旨，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 月 31 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全部由西柏坡迁到北平。

平津战役历时 64 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 52 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在绥远，有意地保存下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经过一段时间，该部在董其武率领下于 1949 年 9 月通电起义，接受

改编。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三大战役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惊天动地的壮举。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三大战役中，各解放区人民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据统计，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陈毅曾深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在三大战役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保证了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

经过三大战役，全国已处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了。



绘制新中国的蓝图

1949年的元旦来到了。

这一天，蒋介石受到内外压力，不得不发表“求和”声明。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存其“宪法”，保存其“法统”，保存其军队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显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作为同国民党政府及地方政府、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声明，表示

“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革命、建设新中国而尽力。

蒋介石越来越孤立了。桂系首领李宗仁准备乘机代替蒋介石，出面同中国共产党方面谈判，争取喘息时间。

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下野后，前往浙江奉化的溪口镇，退居幕后指挥。他规定和谈的“限度”是“划江而治”。李宗仁政府的打算也是“守江谋和”。

已经回到人民手中的北平，迎来了国共双方的谈判代表团。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经双方多次协商后，中共代表团在4月15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4月20日前就协定表明态度。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复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刘伯承、邓小平等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原华东野战军），在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4月20日、21日，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解放军渡江，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252人。“紫石英”号被解放军击伤后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3艘英舰逃走。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甚至主张派出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这表明，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依仗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

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厦倾覆，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还在渡江战役之前，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报告指出，革命胜利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腐蚀，强调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次会议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经过人民共和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经过紧张的筹备，人民企盼已久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加政协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华侨的代表，共662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代表们个个兴高采烈，毛泽东更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在开幕词中说出了一段至今令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会议通过了在一个时期内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

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 56 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会议决定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

在革命胜利的时刻，人们没有忘记为革命而献身的先烈。9 月 30 日晚，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各界人士在这里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为纪念碑起草了碑文，他写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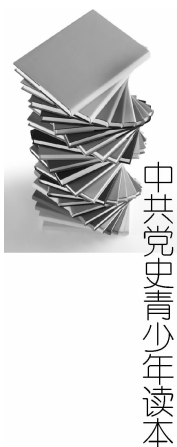
人民英雄纪念碑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在下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一个崭新的国家将同喷薄欲出的旭日一起，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中国历史将由此开始新的纪元，中国人民站起来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 28 年的英勇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毛泽东说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是的，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中国人民，走更长更艰难的道路。



六、 开创社会主义全新事业

1949年，华夏大地盛事空前，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诞生了。然而，新诞生的政权其处境却极其艰难，因为它从旧中国接收下来的“遗产”太微薄了，“白手起家”对于这个政权来说恐怕是最贴切不过了。对此，毛泽东既乐观又形象地把它比喻为“一张白纸”，可就在这张“白纸”上，中国共产党人独具匠心地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创建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张白纸”奠新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定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毛泽东按动电钮之后冉冉升起。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此又揭开新的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旧中国那种四分五裂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占人类近1/4人口的民族从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



开国大典会场

相结合的理论——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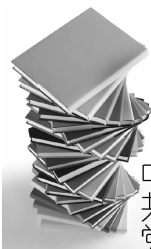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广大劳苦大众由被奴役、被压迫者变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这是人民大众憧憬已久的共产主义春光，当然，这也是广大劳动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之所在。

美的理想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一种企盼，然而，美好理想的全部实现却总是伴随着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困难。一部崭新的共和国历史正是从这种困难与矛盾中开始的。

开国之初，共和国所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虽然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消灭祖国大陆的残余敌人已不成问题，人民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很快就建立起国营经济，并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但是，开国之初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也还是异常艰巨的。

国际上，新中国的诞生，博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赞誉。到1950年10月，已有25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有17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可是，美帝国主义却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我国在政治上采取不承认主义，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在国内，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再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使本来就很落后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到处



是一派千疮百孔的破败景象。

——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与战前相比，农业产值降低两成以上；江岸河堤常年失修，水旱灾情严重。工业产值降低一半，工矿设备多被毁坏……

——交通运输能力遭严重摧残。全国有上万公里铁路线、3 200多座桥梁、200多座隧道被破坏；1/3的机车因破损而无法行驶；几乎没有一条铁路干线可以全线通车；空运所需民航飞机、驾驶员、器材等全部被劫往香港……

——内外贸易滞塞、投机盛行。城市物资严重匮乏，市场混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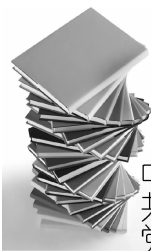
——农村约有700万灾民亟待救济；城市工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失业大军达400万人；还有数百万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需要“包下来”……

这就是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面对这个“烂摊子”，作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是乐观的，把它形象地比喻为“一张白纸”，并且要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而对于这个“烂摊子”，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却断言新中国财政经济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也有人评说：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得0分。然而，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对于面前的困难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当时就曾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情况是困难的，但是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满怀希望，毅然肩负起领导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重任。



边打、边稳、边建

经济的破败，有着战争破坏与天灾人祸等多重原因，而社会经济的混乱，则是投机资本从中为乱造成的。一些不法资本家，在经济活动中不仅不安分守己地进行经营，而且利用国家的暂时困难，为获取一己之私利，大搞投机活动。在国家开支过于庞大和投机资本作祟的双重影响下，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除东北



外，各地物价都猛烈上涨。仅以上海为例，在上述 10 个月的时间里，批发物价就上涨了约 20 倍。剧烈的物价波动，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混乱。为刹住这股投机邪风，稳定经济，发展生产，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对投机资本发动了两大战役。首先是“银元之战”。在当时，银元投机对新中国的经济为害较甚，对此国家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还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然而，投机商对此却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上海，甚至还有人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针对投机资本的嚣张气焰，国家将打击投机资本的矛头首先直指其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一举查封买空卖空、操纵股市的各种证券号、金号、银号、商行等，逮捕了大批交易所不法经纪人，严厉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

继“银元之战”之后，国家对非法资本家又发动了第二个战役，即“米棉之战”。当时一部分金融领域之外的投机商人大量囤积粮棉煤，以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国民党特务还公然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又展开了与投机商人之间的“两白一黑”斗争。对此，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和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在 1949 年 11 月下旬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起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银行收紧银根，令投机资本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又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由于措施得力，人民政府将一度膨胀的物价稳定下来，从而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的胜利，连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也赞叹为“奇迹”，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政治上是坚强的，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统一财经、稳定物价只是新中国经济工作的第一步。1950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他说，为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创造三个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

的大量节减。同时还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要求党在工农联盟基础上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集中打击三大敌人残余。为此，党在农村约3亿多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城市的工商业中，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供销关系进行了合理调整。随着党的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全国的财政经济状况迅速好转，财政收支很快趋于平衡并开始略有结余，国民经济的恢复取得了明显成效。

正当党领导人民齐心协力、重建家园之际，一场与帝国主义的较量发生了。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以武力介入朝鲜内战，把战火一直燃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这已严重威胁到我国领土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安全。对此，应朝鲜劳动党及人民政府的请求，党中央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从10月起，一批又一批祖国优秀儿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入朝参战的头8个月内，中朝人民军队连续发动五次战役，五战五捷，共歼敌23万余人，收复了朝鲜北部原有领土，把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这一系列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迫使美方不得不同意停战谈判。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抗美援朝，目的在于保家卫国，对外的抗美斗争，并未影响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对此，党和政府采取的是“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即战争第一，一切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稳定国内市场，求得金融物价不大乱；进行其他各项带投资性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这实际上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经工作安排的总方针，这个方针的实施，为最终战胜军事上、经济上都非常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为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进行正面较量，中国人民的政治总动员是空前的。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大发扬，民族自尊心与决胜信念空前高涨，从各大城市到偏僻山村，到处呈现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的生动景象。经过边谈边打，1953年7月，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终以美帝国主义霸占朝鲜全境的野心破产而告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完成了保家卫国的历史任务。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一胜利使得全世界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它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而在其背后与不法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却并不顺利。按照《共同纲领》，党和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这一政策应该说对国家和资本家个人都是有利的，但一些不法资本家却仍不改唯利是图的本性，总是力图摆脱国家法令的限制，肆意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以牟取非法暴利。在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下，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内部也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害”现象。“三害”、“五毒”严重威胁着国家经济工作的正常进行，铲除这些现象已势在必行，因此从1952年1月起，一场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国家工作人员中有各类问题的人受到了严肃的组织处理和法律处分，其首要者如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及时任书记张子善，因私吞建筑款、治河款、救灾粮、救济款等罪行被开除党籍、处以

极刑。这大大伸张了正气，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严惩腐败、清廉为政的形象。对于“五反”运动中揭发出的问题，也作了适当处理。到1952年底，除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中国大陆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新老解放区共有3亿多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耕地和相应的生产资料。这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在这一期间以年均增长13.8%的速度向前发展。同时，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取得很大胜利。历时3年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扑灭了曾猖獗一时的匪患，基本肃清了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这一系列社会民主改革和政治运动，始终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使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在短短3年内就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达到或超过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并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还得到了相应的增长，国家已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从而为大规模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过渡时期总路线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胜利完成，如何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采取实际的步骤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便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1953年6月，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构想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中共中央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整个国家和社会进入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阶段。

国家工业化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它反映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百年积弱和贫穷落后的强烈愿望，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为此，国家所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规定投资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五年内，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的总投资累计折合黄金7亿两。

做到这一点，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新生政权来说，是极其不容易的。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总路线的两翼，它将为有计划的工业建设创造相应的、有利的社会条件。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于1951年和1953年先后通过两个决议，要求在发扬土改以后农民对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过渡形式，把农民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经过1953年的稳步发展，到1954年已出现互助组大量转为农业社的势头，这种转变使农村出现紧张情势。中央及时提出“停、缩、发”方针进行整顿和巩固，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这基本安定了农民的生产情绪，从而使农业社的生产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此期间，个体手工业从供销入手，实行合作，国家对其产供销进行统筹兼顾，发展比较平稳。

总路线提出后，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阶段，到1954年底，约占产值1/3的私营工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在私营商业的改造方面，国家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经销代销和统购包销，特别是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已基本掌握了主要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货源，国营商业在批发环节上基本取代了私营大批发商；私营零售商也被逐步纳入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为了建立与计划经济建设和社会社会主义改造相适应的国家体制和法律规范，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正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和集中统一的国家管理体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突出强调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从而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础，从上层建筑方面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提供了保障。同时，党还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思想文化动员，一方面，在党内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增强了全党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虽然斗争不适当地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挫伤了一部分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并造成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错

案，但是总的说来，它对于普及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

随着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工业化对农副产品以及市场、资金等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就同个体农业孤立、封闭、落后、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都很低的现状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便随之加快。自1955年夏季以后，处于整顿和巩固之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下子转入高速发展阶段，仅半年就在农村基本实现了初级社化，并迅速向高级社迈进。到1956年底，基本实现了高级社化。这样，经由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原计划18年完成的任务仅仅7年就快速完成了。这种高速度的发展，突破了中央原来设想的“积极稳步”的方针，这一方面是基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初期工业化战略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因当时对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现象和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过高。

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到来，超出了人们原来的设想，于是党内在合作化问题上便形成了“加速”与“稳步”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后来被归结为让合作化“上马”与“下马”之争。这种划分事实上是简单化了，然而它却导致了对主张稳步发展的邓子恢等人的错误批判，这一批判反过来又助长了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的“左”倾情绪。结果，农业合作化后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生产经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弊病，以致遗留了一些长时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随之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并作出相应的决议，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方针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逐步地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对他们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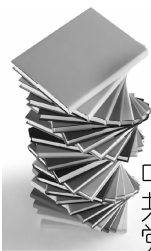
间有贡献的代表人物作恰当的政治安排。在赎买的形式上，确定采取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的办法，促使资本家不太勉强地交出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在上述方针政策下，1956年1月，以北京市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为开端，全国各城市兴起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热潮。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私营商业有82.2%转为公私合营商业或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组）的参加者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1.7%。至此，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确立了公有制的绝对优势，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改造后期存在一些缺点，但总体来说，在有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步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社会经济大变革牵动了国内各种关系的变动，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同各项经济事业相配合的问题亟待解决。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和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直接间接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总方针指引下，提出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整和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经济工作上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要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等等。总之，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的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这些方针指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苦干、实干，终于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工业建立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



年均递增 19.6%；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4.8%；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也比较协调，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这一切，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强国之路，奠定了国家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初步基础，共和国从此走进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七、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到天安门广场欢庆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喧天锣鼓，人类开创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还不到40年，社会主义事业虽显示了它的辉煌，但历史却显得有些短暂。在这开创不久的阳光大道上，社会主义建设到底该怎样搞？毗邻的“老大哥”有些经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对此，中国无法完全“照抄照搬”，只能走自己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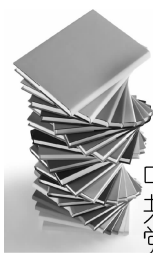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1956年9月15日，秋高气爽。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1026位中共代表会集于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这里举行。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这是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果说11年前召开的党的七大是为建立新中国制定路线和政策，那么，这时召开的党的八大则是为建设新中国制定纲领。大会首先分析了现实国情，指出：中国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开始进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

为了完成上述根本任务，大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在经济建设方面，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国家工作方面，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逐步健全国家法制；在党的建设方面，把执政党的建设提到相当的高度来看待，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文化科学建设方面，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以五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

后来的实践表明，党的八大所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它所提出的许多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党的八大表明，在即将迈出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第一步时，中国共产党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又没有照搬经典著作的条文，吸取了苏联的有益经验，但又不全盘仿效苏联模式，而是确立了自己的原则，那就是“走自己的路”。



社会主义社会也难免有矛盾

八大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风波迭起：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第一次在党内公开揭露斯大林的错误；6月，波兰波兹南地区工人罢工；10月，匈牙利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以至酿成暴力冲突。东西方为之震动，资本主义阵营借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

在中国，从1956年秋开始，一些地方少数人闹事，工人罢工、

学生罢课、农民退社时有发生。党外人士和知识界一些人也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

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到底有没有矛盾？若有，属于什么性质？有何特点？应如何处理？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精辟地提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矛盾，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情况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是非对抗性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量的、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尤其是两类矛盾学说，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突发事件的原因，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特点、解决途径，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崭新的内容。3个多月之后，《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英国学者评论说，它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革新”。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的提出，为党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提供了武器，党正是根据两类矛盾学说，在全党范围内整顿思想和作风，旨在克服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以便加以改进。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正式开始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跟以往不同，这次是共产党敞开大门，邀请党外群众帮助整风。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多次召开各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也分别召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征求党外群众的意见。从知名人士到普通公民畅所欲言，从中共中央主席到基层党员洗耳恭听，全国上下一时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整风是必要的，一开始其效果也是好的，然而，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利用整风，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的还采取根本否定甚至敌视的态度。这样，5月中旬以后，运动的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这种反击应该说是必要的，不幸的是，这一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共产党整风的和风细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急风暴雨。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不过，这一年经济工作仍正常进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效果较好的年份之一。但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还远未改变，人们迫切盼望甩掉贫困包袱的重任仍很艰巨，整个中国正在酝酿着一股建设的热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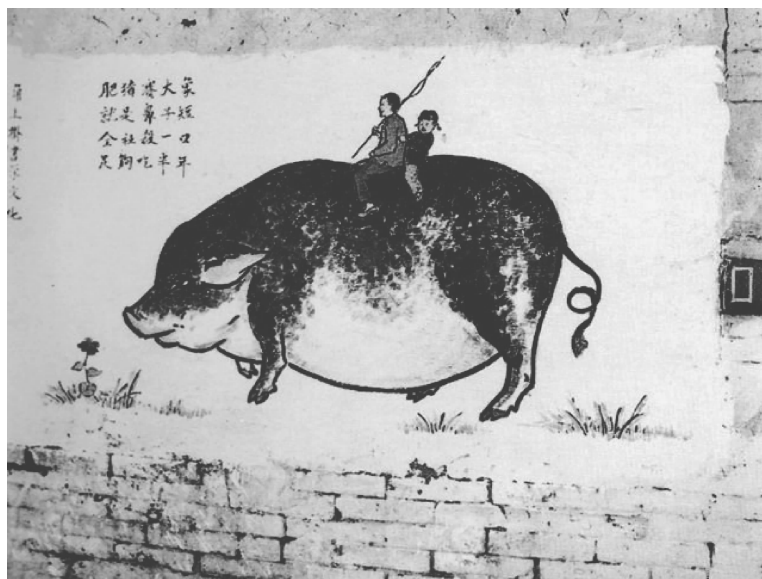


探索艰辛亦曲折

1958年新年钟声刚刚响过不久，毛泽东就启动了他的南方之行。在南行途中，他召集了一系列中央会议，研究经济建设问题。或许是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然，再加上头几年建设成就所增益的喜悦，人们干社会主义的热情在“反右”的气氛下愈加膨胀，使得党内一些同志热情压过了冷静。这种头脑发热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一样，他继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对1956年的“反冒进”批评得更加严厉，甚至把“反冒进”说成是“右倾”、“促退”，并从批“反冒进”转而提出了“大跃进”。在这种气氛下，南宁会议、成都会议还进而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跃进”压倒一切，超英赶美充斥着人们的头脑。

热望里包含了冲动，企盼中潜伏着急躁。“左”倾冒进错误逐渐发展起来。

1958年5月，党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普遍愿望，这种愿望当然是好的，但却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会后，各行各业纷纷“插红旗、拔白旗”，重拟“跃进”指标。在“跃进”气氛的熏染下，一时间，“三大元帅（即粮、钢、机械）升帐”的口号不绝于耳，“高产卫星”的报道连篇累牍。甚至有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惊人设想。浮夸风、高指标风愈刮愈烈。



“大跃进”宣传画

在“跃进”锣鼓的喧嚣声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也出台了。各地将小社并大社，实行政社合一。在8月到10月短短的两个月里，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民达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当时提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一时，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在农村得到推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出现了“走偏”现象，人民生活全面紧张。这引起了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思考。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8年回到久别的故乡湖南调查时，一位老红军战士递给他的一张纸条上所写的“民声”。其实，彭德怀一踏上家乡的土地就看到了那张纸条上所描述的情景，而这种情景也是全国各地情形的一个缩影。

严峻的现实终于使狂热的情绪有所冷却。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河南郑州召集部分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他提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种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毛泽东批评了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强调在农民问题上必须谨慎小心。随后，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批评“共产风”的同时，还提出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企图过早否定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企图越过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错误，重申两种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八届六中全会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展整社工作。毛泽东花主要精力对人民公社问题继续进行研究。当他发现“共产风”仍未有效制止时，于1959年2月至3月在郑州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会议要求承认社员与社员、队与队之间的合理差别，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3—4月间，中共中央在上海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检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进一步降低了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左”倾冒进错误的势头有所抑制。

但是，纠“左”是在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使纠“左”本身受到很大局限。因此，“左”倾冒进错误仍然存在抑而不止的现象。

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前一段纠“左”的工作，研究今后的工作部署。会议在肯定“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执行政策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会议前期总的说还是有成效的，但由于党内对错误的认识存在着严重分歧，以至于会议的后期导致了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并在全中国开展了所谓的“反右倾”斗争。庐山会议打断了纠“左”的进程，前一段纠“左”的努力付诸东流，曾经受到抑制的狂热情绪重新又膨胀起来。1960年，又掀起了“新的跃进”，“左”倾冒进错误再度泛滥。最终，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陷入了严重困境。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中国遇到了第一次大波折。这表明，“走自己的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坦途，会遇到许多坎坷，会走许多弯路。在经过坎坷、走过弯路之后，人们还会在总结经验教训中继续开拓前进。



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全面调整.....

195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已出现了不正常状态。在农村，由高指标所引发的征购过量反过来又带来了农村经济的严重紧张，很多地方商品缺乏，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粮荒，有的地方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在城市，因为国民经济各项比例严重失调，一方面造成了生产停滞，商品紧缺，另一方面却又导致职工人数激增，城市人口膨胀。人们买不到肉、菜、蛋，粮食也只能限量供应。

从1959年起，共和国进入三年严重困难时期。

在中南海，毛泽东同全国人民一样，把自己的口粮压缩到最低限度。对于1958年以来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大跃进”运动和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毛泽东是抱着肯定、赞赏和爱护态度的。然而，运动中出现的浮夸和急于过渡等现象，他也深感忧虑，这时他已意识到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他提出，1960年的计划要加以调整，指标应留有余地，宁可少一些。同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强调，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5年不变，这一思想后来反映到《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简称十二条),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等重要文件中。这种思想认识和以前相比更接近客观实际,它在解决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

同年9月,国家计委提出要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精神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对这八字方针正式给予确认,并将其确定为整个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这表明了中央要实事求是调整经济的决心。

八届九中全会后不久,中央主要领导人纷纷深入到全国各地,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上至领袖,下至基层干部,尽管观感不同,认识各异,但都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心理。正是在这一心理与思想的作用下,于是有了“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962年1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7000多名干部,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就“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之得失,畅所欲言。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将中央的报告直接交会议讨论,不再照本宣科,以便更充分地听取与会者的意见。

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建设工作方面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毛泽东坦率地承担了领导责任,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从没经验到有经验,从认识的必然王国,达到认识的自由王国。只有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刘少奇讲到了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指工作错误)”,这一观点在与会者中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开始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框框”。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会议尚不能从指导思想方面根本解决问题。

“七千人大会”后,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调整的意识,已经在人们头脑中树立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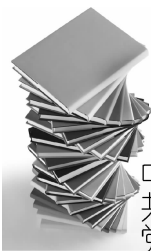
“七千人大会”曾经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但到1962年2月,人们发现当年预算竟隐藏着高达几十亿元的赤字,这又引起中央一线领导人的高度警觉。



七千人大会

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在会上，陈云认为，当前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对经济恢复的速度，要“争取快，准备慢”。他建议，把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为恢复阶段，后五年为发展阶段。为此，必须把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保证市场放在第一位。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做坚决的调整。

“毒蛇噬臂，壮士断腕”，“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三年经济调整中，人们常常用这样两句话表示对调整所抱的决心。事实上，没有“伤筋动骨”的动作，调整不可能真正收到成效。从1961年初至1963年6月，全国共精减职工约200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这两个数字相加略等于法国的人口，当时周恩来风趣地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可见压力是不小的。在压缩基建规模方面，投资由384亿元减少到67亿元，施工项目由82000个减为25000个。积累率下降了29.2个百分点。工业战线，以必要的关、停、并、转为手段，将工业总产值降低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下降57%。



与国民经济调整相并行，党对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首先，对那些自 1958 年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给予甄别和平反；其次，使科学界、教育界、文化界，以及知识分子中长期形成的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得到松弛。1961 年 7 月至 1962 年 4 月，中央先后批发了“科研 14 条”、“高教 60 条”、“文艺 8 条”等文件，强调纠正“左”的偏向，贯彻“双百”方针。尤其是在 1962 年 3 月的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还代表中共中央肯定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在思想和立场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陈毅还幽默地说，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这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授予他们最高奖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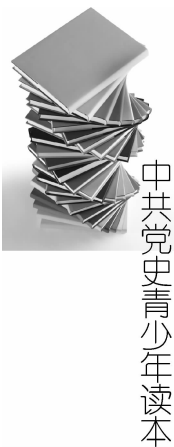
1962 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3 200 亿斤，比上年增产 250 亿斤，结束了 3 年连续下降的状况。1962 年财政收支大体持平，城乡人民碗里开始见到了肉，身上添了新衣。至 1965 年，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工业内部之间的关系已经协调，工农业总产值连年增加。市场供应明显改善，财政收支达到平衡，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就经济形势而言，1965 年已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最好时期。这一切表明，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全面完成。



滑向阶级斗争的历史误区

经济形势的好转，给人们增添了喜悦，而政治认识的偏离却引起了人们的担忧。1962 年 7—8 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又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要大会讨论。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自己也作了多次发言，重点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对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问题一向极其敏锐，他提出阶级斗争问题绝非无感而发。正在进行中的国民经济调整，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上，都对“大跃进”以来党的指导思想方面的“左”倾错



误提出了实质性的否定，毛泽东认为，这是党内发生了“右倾”。正是从这种思想认识出发，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在他看来，当时对严重形势的冷静估计和要求把困难估计够是“黑暗风”；当时各地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党内邓子恢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是“单干风”；彭德怀对批判他“里通外国”的申诉是“翻案风”。

令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农村出现了“单干风”。毛泽东说，动摇分子中坚决闹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连赫鲁晓夫都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呢。

早在1959年，部分农村就出现过“包产到户”，1960年后，安徽、广西等省区再次有“包产到户”等生产组织形式出现。这完全是农民迫于生计而萌生的一种“发明”。1961年，安徽省委发现这种形式可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决定在本省部分地区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田制度”。随着调整的深入，中央一线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倾向于因地制宜地确定农村生产责任制，认为只要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就可以多进行一些试验。

但毛泽东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面对暂时的经济困难而支持“包产到户”，是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并将这种“动摇”同阶级斗争问题联系起来。基于这种认识，再加上对国际以及国内所谓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解，毛泽东便提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八届十中全会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呈现了一种“双走向”：一方面是经济运行朝着复苏、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政治风向日益强劲。

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往往是国内政治天平倾斜的砝码。从60年代初起，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妄图包围孤立中国的用心愈益明显。美国不仅加强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使越南战争升级，而且在我国周边地区也推行包围、封锁政策。盘踞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亦蠢蠢欲动，不停地叫嚣要“反攻大陆”，企图东山再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由于中共、苏共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诸多分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较大的裂痕。

中共、苏共两党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了国家关系。继1960年苏联

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之后，1962年的4—5月间，苏联又策动新疆塔城、伊犁边民暴乱和大量外逃。并且它还与美国等达成旨在剥夺我国拥有核武器权利的所谓防止核扩散协议。

这一切，都是在我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发生的，对于不信邪的中国人来说，这会激发起怎样的同仇敌忾和奋发图强意识，是不难想象的。60年代前期，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民经济很快得到好转，同时，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央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的战略构想，并加紧“三线建设”。

但这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还难以保证国家不改变颜色，而要保持正确的方向还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斗争。鉴于苏联的教训，他提出了“反修防修”的重要课题。

八届十中全会后，他“意识”到党内还存在着许多“黑暗面”，随着国际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化，他愈发感到国内、党内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从1962年起，先后展开了对“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统战工作中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文化部门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经济理论方面的“价值论”等的批评与斗争。1963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了湖南和河北农村中进行“四清”（“四清”所清的内容前后有所不同，初期为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期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全国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动，很快就演变成为一场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政治斗争，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有了新的发展，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

八、“十年”磨难与抗争

从1966年到197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华夏大地上发生，说是“大革命”，实际上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内乱延续了10年之久，广大人民群众饱受磨难，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对此，广大干部和群众虽奋起抗争，但由于“左”的束缚和“左”的干扰未能破除，所以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在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这场内乱才宣告结束，党和国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又焕发了“青春”。



狂风骤起

正当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胜利完成，从1966年起即将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却在阶级斗争观念日益膨胀的情况下发生了。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出面组织，在秘密状态下炮制出笼的。除了毛泽东外，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内情。这篇文章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把



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的明朝清官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到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为在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全面的“揭盖子”，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政治批判运动。

1966年2月，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称《二月提纲》），试图对已经发动起来的批判运动加以适当约束，将其置于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然而，这一意图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旨相悖，所以未能收到预期效果。

相反，当江青发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阻后，紧接着又与林彪勾结，炮制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毛泽东对《纪要》抱支持态度，并以中央名义批发全党。

在此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一些中央领导人展开了批判。这样，“修正主义”就不只存在于文化领域，党内军内也都有了苗头。于是全党都被极度紧张的气氛所笼罩。

在这种气氛下，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并解除了他们的领导职务。16日，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针对《二月提纲》进行全面批判，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五一六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该小组实际上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机构。

5月底6月初，从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到青年学生起来“造反”，这一系列行动表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大规模

的政治运动已正式开始。

为进一步制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措施，排除所谓“运动的阻力”，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领导等根本问题都作了有严重错误的分析和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方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与此前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审查和批判。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热情支持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于是红卫兵运动一哄而起，由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展为全国范围的“造反”，揪斗“走资派”，“炮打”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红卫兵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派别斗争，形成了“天下大乱”的局面。



所谓的“一月革命”与二月抗争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委的党政大权。这一公然夺取党政大权的事件，在当时被称为“一月革命”。以上海“一月革命”为发端，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基本完成。

在此期间，社会的动乱引起了党内一些同志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抵制。1967年2月，在两次有许多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

局和军委的领导人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了强烈批评。这一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并受到严厉批判，中央政治局实际上从此停止了工作。

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局势，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签发通告、命令等文件，并派军队进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虽然力图通过这些措施控制和稳定局势，但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特别是江青提出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后，社会动乱非但没有得到控制，相反却愈益加剧，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大规模的武斗迭起，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下，1968年10月，党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次全会错误地批准了江青、康生等人以伪证为基础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共和国主席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职务，这无疑是党内一起最大的冤案。

与刘少奇被开除出党相反，野心家林彪却在政治地位上越爬越高。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林彪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经验”，提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等任务。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言行和他善于隐蔽的阴谋伎俩，蒙蔽了许多人，包括毛泽东一时都对他产生了信任。因此，九大通过的党章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林彪、江青等帮派体系的一批骨干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九大的突出特点，就是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毛泽东作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口号的声音打断数十次。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其指导方针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滑向了错误的一边。因此，它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九大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毛泽东设想由此达到“天下大治”，但是“斗、批、改”本身是“左”倾方针的产物，随着运动的发展，不但“天下大治”未能实现，相反

“动乱”却更难以收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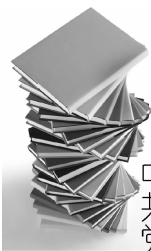


林彪集团折戟沉沙

随着“文化大革命”不断走向狂热，林彪的政治地位也不断上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逐渐结成了集团，并控制了中央军委办事组等很大一部分权力。通过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林彪集团的权势更加扩展，其野心也逐步恶性膨胀。他们与江青集团既互相勾结，又不断发生利益冲突的矛盾。林彪集团逐渐意识到江青集团的势力发展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此开始策划提前“接班”、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提出改变国家领导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觉得这一设想有碍他抢班夺权的步伐，因而反对毛泽东意见，坚持设国家主席。表面上，林彪集团喊着拥护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口号，骨子里却是想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作为“接班”的一个步骤。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会上抢先发表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在次日的分组会上，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按事前的密谋，分别在各组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攻击江青集团，企图从政治气氛上将江青集团压下去，这种攻击在会上引起了一场混乱。毛泽东发现苗头后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而对林彪则采取保护态度。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已准备采取措施逐渐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因而逐级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看到政治形势明显于自己不利，林彪集团试图铤而走险，策动武装政变。1970年10月，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林立果等人炮制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为武装政变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南巡途中同沿途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批评林彪“要



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集团得此密报后，决定在旅途中对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进而发动武装政变。由于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采取机智措施，林彪集团的谋杀计划破产。9月13日，林彪等乘飞机仓皇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荒漠。



林彪坠机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党内外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竟阴谋杀害毛泽东，以至叛国出逃；为什么新擢升的六名政治局委员竟然一同从事反革命活动。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这些现象之所以会发生，当然是“文化大革命”背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乍暖还寒，周、邓纠“左”的努力受挫·····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和减少事件的不良影响。9月至10月，逐级传达了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从12月起，党中央陆续批发了关于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

变的3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为纠正“左”倾错误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局面，周恩来着重抓了企业整顿工作，恢复和健全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同时，在农村工作中，着手纠正一些“左”的做法，并利用毛泽东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有利时机，从全局上推动这项工作，使大批遭受打击和迫害的干部和专家、教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973年3月10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在外事工作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1971年10月25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日也正式恢复了邦交。从1970年到1976年，有60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时已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由“文化大革命”前的49个上升到110个。

此外，在恢复教科文等部门的正常工作方面也取得进展。

在推进各方面工作的调整过程中，周恩来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意见，以清除“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的影响，但这一意见却遭到江青集团的反对。毛泽东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主张，认为当时的任务是反对极右，因此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主张。这样，周恩来的纠“左”努力被打断。

为了解决林彪事件后的重大组织问题，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党的十大在北京提前召开。十大本应成为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的良好时机，然而十大不但未能使上述问题得到解决，相反却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和党章，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强调全党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在这样的“左”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左”的错误也就自然得以延续。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凭借其膨胀的权势，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向极端，先后发动了“反右倾回潮”运动、“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使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重新遭到破坏。

1974年10月，“四人帮”借四届全国人大即将召开之机，加紧阴谋活动，妄图由他们“组阁”。他们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对此毛泽东已有所觉察，因此他们的诬告遭到毛泽东的批评，而这时毛泽东却多次提议委任邓小平以重要职务。1975年1月，四届人大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从而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全国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不顾刚刚出来工作不久的困难处境，努力排除江青集团的干扰，召开解决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从整顿领导班子、批判和消除派性入手，自1975年2月起，大刀阔斧地对铁路、工业、军队、科技、文艺等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

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开始是支持的。2月，全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后，“四人帮”趁机大反“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人。毛泽东觉察“四人帮”的意图后，对他们提出了批评。5月、6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的错误言行。这些批评，使“四人帮”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由于邓小平等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毛泽东对“四人帮”一定程度的扼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工作，整顿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1975年的形势明显好转，一些地区的武斗受到抑制，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

然而，整顿虽然取得了成效，可整顿与反整顿的斗争却没有停止。9月，评《水浒》运动开始后，“四人帮”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

来和邓小平，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另外，邓小平主持各方面整顿工作，不能不触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也不能不对这些错误进行比较系统的纠正。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此是拥护的，但“四人帮”却疯狂反对，毛泽东也难以容忍。

1975年9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在无法全面了解情况的状态下，根据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联络员的毛远新的汇报，认为邓小平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不久，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反映清华大学党委领导问题的两封信，毛泽东认为信中的矛头是对着他的，于是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并由此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形势再度发生逆转。



铲除“四害”，结束“文革”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实，又不得人心。人们切身体会到邓小平主持整顿的正确性和所取得的成绩，也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真面目。因此，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实际上从一开始广大干部和群众就以不同的形式加以抵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人们心中早已积聚而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激愤情绪终于以此为契机迸发出来。人民群众利用清明节缅怀革命先烈的传统习俗，从3月中旬开始，掀起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全国性抗议运动。这一运动被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于4月5日遭到残酷镇压。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任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悼念周恩来，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鲜明地表现出人心的向背，这一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9月9日，毛泽东逝世。毛泽东逝世后，江青集团进一步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

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同时对“四人帮”在北京的党羽也采取隔离审查措施。接着又挫败了“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阴谋。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10年之久的灾难终于结束了。

10年“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历史上是“左”倾错误统治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这10年，国家和民族所遭受的灾难是深重的。不过，由于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同“左”倾错误，特别是同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和英勇的斗争，因而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受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10年间，我国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就。杂交水稻、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技术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是广大工人、农民、科学技术人员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克服“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破坏，党和国家的事业无疑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九、徘徊前进与伟大转折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旧的束缚被铲除，党的事业本应在新的条件下顺利前进，然而，这时却又出现了与历史潮流相悖的“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在它的干扰下，我国的社会进程出现了本不该出现的徘徊。对此，老一辈革命家们和广大干部、群众，以实事求是和真理标准为武器，一举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经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航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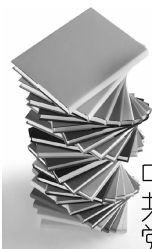
“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之争

1976年金秋10月，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景象，饱经磨难的人们又焕发了青春，天安门广场红旗似海，人涌如潮。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的风风雨雨之后，各族人民为“四人帮”的被打倒而欣喜若狂，这种喜悦心情既带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解脱的欣喜，也饱含着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与憧憬。

这种民心所向在当时集中表现为两股呼声：一是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呼吁请邓小平复出。

然而，人们的这种热切期望很快却因“两个凡是”的提出而蒙上了一层阴影。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



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后来被称之为“两个凡是”的方针，使党内外的有识之士开始感觉到，通向未来的道路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而变为坦途，仍然存在严重的思想障碍。

显然，要把拨乱反正工作引向深入，就必须冲破“两个凡是”的藩篱。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不顾个人的艰难处境，给中央写信指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他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

在此，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击中了“两个凡是”将毛泽东晚年错误混同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要害，成为全党走出“两个凡是”、解放思想的先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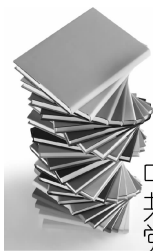
在同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这是人们同“两个凡是”的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但此时，“两个凡是”的堡垒还远未被摧毁，老一辈革命家们高举着实事求是的旗帜还在继续进行斗争。这一斗争最终发展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聂荣臻、陈云等老同志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原则的政治氛围下，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在不显眼的位置发表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评论。这个评论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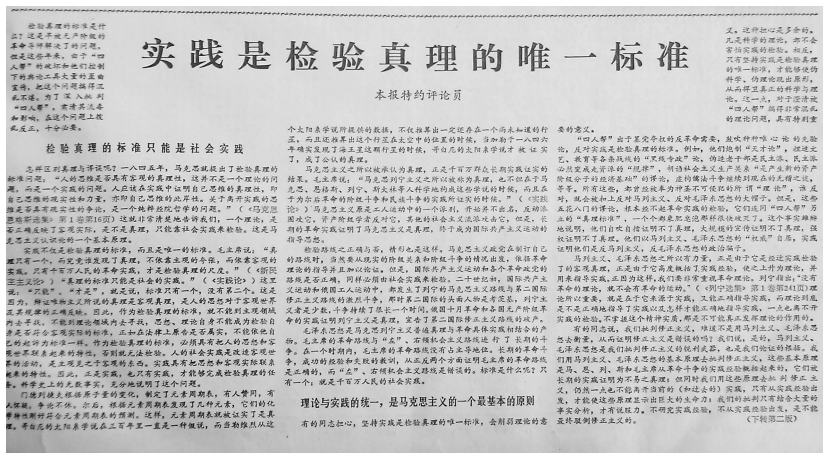
这一切说明，从老一辈革命家到普通百姓，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这种斗争业已预示了一场思想解放的洪流即将来临。

1978年5月11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这篇文章所阐发的“实践标准”的观点恰好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因此，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也发了通稿。于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便由此引发。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于是，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新的里程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便在各界轰轰烈烈地展开。

与理论讨论相映成趣，这年6月底开始，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大军区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表态，既肯定这场讨论的理论意义，更侧重于它的政治意义，认为这确实是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问题。党政军和各省市负责人的参与，无疑增添了讨论的政治色彩，同时也对争论的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通过这场讨论，人们开始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促进了思想的大解放，从而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人们的头脑开始进一步活跃起来，历史转折的步伐也随之加快。

对于平反冤假错案，人们的呼声越来越高。1978年下半年，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以及胡耀邦等人的推动下，党中央同意由中

央组织部对薄一波等 61 人所谓“叛徒集团”案进行重新审查；批准在对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全部摘帽的同时，对错划的右派予以改正。到 1978 年底，中央和国家机关 6 000 多名待分配的干部已有 5 000 多名得到了安置，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广大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也愈加高涨。所有这些，都为党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备了干部力量和群众基础。

在这段时间内，党内不少同志在树立实践标准、破除“两个凡是”的过程中，开始对我国 20 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反思，并逐步改变了以往对于社会主义的那种粗浅的、片面的认识。很多同志通过对国外情况，特别是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人们开始思索我国所存在的经济技术落后与管理体制僵化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国务院于 7 月至 9 月间召开为期两个多月的务虚会，研究如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改革经济体制，变革生产关系，引进先进技术等一系列新设想被大胆地提了出来。随后召开的计划会议，又提出了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这些带有启发性的思想，对于后来转折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作了准备和奠定了认识基础。

197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为期 36 天的工作会议。按照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宣布的议题，会议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 1979 年、1980 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按照会议事先的安排，在讨论上述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下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 1979 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11 月 11 日开始分组讨论，当天就有人提出了“天安门事件”等重大错案的平反问题。12 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系统地提出了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共鸣，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

在与会者广泛展开讨论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25日，华国锋在会上宣布了政治局的决定：为“天安门事件”、所谓的“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案和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的错误处理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平反。这就使得两年来广大干部和群众一直强烈呼吁的几项重大问题基本得到了落实。因此，与会同志更加感到心情舒畅，从而对各项问题的讨论也更加深入，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一些曾存在模糊认识的同志也转变了思想，并作了自我批评。

根据与会者的讨论，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批评了“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解放思想和打破僵化的迫切任务。这篇“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在经过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从12月18日起，召开历时3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

按照华国锋的原来计划，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只是经济问题。由于在会议上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的讲话和发言，这次会议突破原来的议题，开成了全局性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恢复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围绕这一主题，会议对政治、经济、历史遗留问题和思想路线问题等都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策。会议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会议的这些成果，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这次会议的伟大功绩就在于，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汲取了一切过去曾经提出过的好思想，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基本上消除了已经由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十分有害的过去坚持过的“左”的指导思想及其一切表现。在这些问题上，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期间未能做到，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却做到了。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和新的里程碑被载入党史的史册。这次大会以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因而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便迅速地展开。

在三中全会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结论之后，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党又于1979年1月至4月，分两阶段召开了理论务虚会，对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区，并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工作重点转移后所面临的新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讨论中的意见，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之后，又重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正确的阐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缩小了或夸大了，都要犯严重的错误。与此同时，党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还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了进一步清理。指出，这个理论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所以不应当继续使用。

另外，党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也恢复到八大的正确认识，经济领域的许多理论问题也得到正名；以民主为中心的政治理论问题受到全社会的空前关注，根据新的形势作出了诸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理论概括。更为重要的是，这期间针对一些人对“解放思想”的曲解、思想信念的动摇和企图否定

党的领导等情况，邓小平于1979年3月旗帜鲜明地提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也正是在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和保障之下，党内外才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



拨乱反正与新局面的开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工作立即展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立见成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一结束，党中央就为彭德怀、陶铸公开平反，并为他们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继之，中央又陆续为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一大批老革命家平反。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在此前后，党还为一批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平反。同时，还对一些部门和一些事件在过去所蒙受的“不白之冤”给予纠正。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诸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这使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级干部及党外著名人士约300万人获得了新生；为54万名属于错划的“右派”分子和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为过去以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对待的70万原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此外，还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及去台人员的家属落实了政策。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解决了多年积累的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使社会关系得到了合理的调整，促进了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发展。

(1) 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得到端正。鉴于“新的冒进”所带来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党接受陈云、李先念等人的建议，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经过几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也从根本上得到端正；邓小平提出的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

思想成为经济领域及其他领域工作的主题。

(2) 政治建设步入正轨并获得较大发展。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从宪法中取消，恢复、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和法令。作为政治建设的核心，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其他党内法规的制定，促进了党内民主的发展。党内外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得以形成。

(3) 农村实行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第一步改革。到1982年6月，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这种“双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经达到71.9%，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占总数的67%，“包干到户”已经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扩权试点”的步伐；对外开放在广东、福建两省推出了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深圳、汕头、珠海、厦门4市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已经打开。

(4) 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党在加强了集体领导、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同时还扩大了人民民主。

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逐步展开的情况下，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还对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而逐步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进行了10个方面的概括，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的前进方向。

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调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确立。

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带着这一重大收获，党领导全国人民又迈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起点。

十、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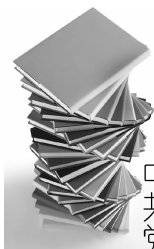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党心大快，民心大快，上上下下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于是广大干部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迸发出来，改革开放以此为底蕴，以党的十二大精神为指导，开始全面展开。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之纲领

经过全面拨乱反正，党在总结过去和对改革开放初步探索的基础上，又积累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认识。在这种背景下，党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十二大。

党的十二大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这一历史性的任务，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要求党和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所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实际上成了十二大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了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有了这一思想，人们就像有了一盏指路明灯，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关于开创新局面的具体任务，胡耀邦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中要求人们作如下努力：在此次大会到下次大会的5年间，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社会风气和党风的三个根本好转。作为各项工作中的首要任务——经济建设，要求到20世纪末力争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部署上：要以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为重点，前10年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十二大以后，作为全党工作的中心，党在经济工作上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1）继续贯彻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加强重点建设和薄弱环节。到1983年，农轻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各占1/3，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比较适当；工农业总产值和33种主要产品产量提前达到“六五”计划指标。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良性循环的轨道。（2）在继续进行企业扩权试点的同时，在以税代利、政社分开及商业、旅游、外贸等方面扩大局部改革范围，并在沙市、常州、重庆等一些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1984年9月，国务院还就计划体制、价格改革及国家领导经济的问题提出了意见。这表明党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路已经基本理清。

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和迎接全球性的挑战，党决定进一步加快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此，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这个《决定》除了阐明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及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外，还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

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它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它突破了长期以来人们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对这个文件给予高度评价，称它为“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这个《决定》的推动下，从1984年第四季度起，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围绕着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在计划、价格、财政、税收、金融、分配及劳动工资等诸方面迅速铺开。与此相应，农村改革继1983年实行政社分设，将人民公社改为乡（镇）政府之后，1985年又迈出了以改革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到1987年，农村非农产业价值首次超过纯农业产值。

在推进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党还对科技和教育体制着手加以改革。1985年3月和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便由此提上日程。

十二大后，在大力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也大踏步地向前迈进。1984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初，又决定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建立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海南岛在1983年开始实行特区政策的基础上，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一个完整的省级经济特区由此得以形成。这样，我国就形成了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滚动式的对外开放格局。

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空前发展。到1987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都比改革前翻了一番，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改革措施的不配套和在某种程度上的急于求成，国民经济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农业生产自1985年

连续几年出现“滑坡”，这无疑对改革和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都是不利的。在此情况下，开拓有利的建设环境，对经济作进一步的调整已势在必行。



营造有利的建设环境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环境也被提上日程。对此，党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加强了努力。

在国际方面，中共中央和邓小平认真分析了全球大势之后，认为：当今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是东西问题即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即经济问题。战争的危险虽仍然存在，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判断。

根据这一判断，我国的对外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党逐渐改变了较长时期以来，以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为主要目的的‘一条线’的外交方针”，在同美国、西欧、日本继续发展关系的同时，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逐渐恢复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接触和交流。新的外交政策显示了两大突出特点：一是在战略上搞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使我国在国际活动中回旋余地更大；二是高举和平的旗帜，争取更多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中心是争取有一个更好的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根据我国新的对外方针，国防建设思想也朝着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大局，支援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方向作了调整。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郑重宣布，人民解放军将裁减员额100万，并决定实行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在各方努力下，到1987年底，裁军百万的巨大工程宣告完成。同时广泛开展了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活动，军队在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和抢险救灾方面发挥着比以前更加积极的作用。

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内在助力和有力保证。对此，党一直没有稍许放松，根据十二大的决定，从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开始，到1987年5月，全党分三期进行了整党工作，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进行全面整顿。通



过这次整党，总的说来，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四个方面，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都有所进步。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党的十二大把它摆到了重要位置。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基本方针。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取得了成绩。然而，由于在贯彻执行方面尚存在着某种缺陷，因而1986年底到1987年初，上海、北京等地曾一度发生了学潮。对此，党领导人民展开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克服了其消极影响。

诚然，克服各种消极因素并非易事，由于这时经济体制改革还不够配套，某些私心较重的人不时钻改革的空子；在对外开放中，一些消极因素像病毒一样随时都在侵袭着那些意志薄弱者。对于这些影响改革开放的消极因素，中共中央分析认为，除了别的原因外，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此，邓小平于1986年6月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此后，他又多次谈到这一问题。根据他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86年9月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1987年10月形成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这一设想得到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的原则同意。这个设想的主要内容写入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这次大会吸收和发展的几年来党对国情进行再认识的成果，较系统地阐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这次大会的突出贡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阐明两层含义：其一是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其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前此已多次提到，但这次大会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这一深化了的理论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更加明确，它为理解以往的成功和失误，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未来提供了一把钥

匙，同时它也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理论武器。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一贯坚持的路线，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这次大会除了上述贡献以外，还确定了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其中经济发展战略的部署是：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战略部署是邓小平在1985年经过反复考虑后提出来，党的十三大确定了的。

十三大在作出上述阐发和规定之外，还对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所形成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作了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结合，在我国已经历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了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是对我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理论总结，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是把我们的事业引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十三大以后，改革开放显示出更为强劲的势头。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起步，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理顺党政关系以及政府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方面都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并针对存在的腐败现象，花大力气以推进廉政建设。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在完善企业承包制等改革措施的同时，针对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提出要

大胆闯关，准备把价格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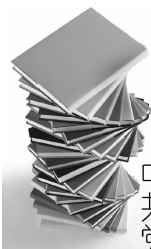


平息政治风波，加强治理整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然而，此时经济领域中的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其集中表现就是：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呈加剧之势；国民经济中结构性矛盾再度凸现，农业重新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经济秩序出现紊乱现象，从生产到流通各领域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混乱现象。加之 1988 年的价格闯关和新闻媒体对此的大力宣传，致使群众的心理出现了恐慌。这不仅使改革的经济环境遭到破坏，同时也使人们的经济和心理承受能力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自 1988 年夏季开始，全国蔓延起一股抢购、挤兑风潮，这种风潮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这种局势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88 年 9 月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前提下，把 1989 年和 1990 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上来。会后，在财政、金融、物价、税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初步遏制住了较高的通货膨胀势头，使一度混乱的经济形势开始稳定下来。

正当治理整顿进行之际，1989 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场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波。风波发生后，中央政治局及时果断地平息了这场风波。1989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由此产生。

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方面通过 1989 年 11 月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加强治理整顿；另一方面，在廉政建设、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同时还展开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教育。1990 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所有这些都在稳定政治形势，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到1990年底,经过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七五”计划基本胜利实现,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当“七五”计划胜利完成,“八五”计划即将开始执行之际,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1991年到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建议》规定:今后十年,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其主要精神是:第一,要把发展经济作为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发展经济既要注重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质量;第二,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建议》强调全党要坚定不移地为胜利实现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宏伟任务而努力。为切实实现《建议》的要求,1991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召开的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当代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特别强调进一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在党的各项部署和决策的感召下,党和各族人民又开始向新的目标努力奋进。

十一、 踏入改革开放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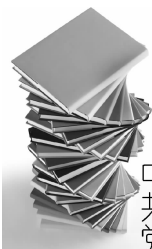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这对于广大的实践者来说，难免要经历一番探索与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确立，应该说就是这种探索与选择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正确选择，正是有了这一选择，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才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跨入改革开放新阶段。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目标

经济秩序的好转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也应该看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并非一帆风顺，还依然是挑战和机遇并存。

从国际方面看，一些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力图通过提高科学技术以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对经济制高点的争夺和经济集团化，使得以发展经济为特征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面临的发展处境就更加困难。仅就我国的周边形势而言，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迅猛，亚洲“四小龙”发展势头强劲，后起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的发展也很快。所有这些，都使中国领导人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压力。

从国内方面看，经过3年治理整顿，虽然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都出现了新的起色，但此时财政困难和财政赤字增加的问题还尚未得到根本控制，国企改革还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不仅如此，此时还有一些情况值得注意：在治理整顿过程中，有些地方出现某些与改革开放不相协调的消极现象：限制个体工商户，平调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的产品，又要收回承包给农民的土地等等。对此，一些农民提出疑问：“是不是党的政策又要变了，又要搞过去人民公社那一套？”

正当人们疑虑重重的时候，国际上又发生了苏东剧变。面对国际国内的各种新情况，一些人一时难以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甚至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疑问：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于1992年1月至2月间，专程来到我国南方，先后视察了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就当前一些人们广为争论的问题展开调查研究。他通过视察，进一步了解了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坚定了对改革开放的信心。于是，他就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谈话共阐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核心是“加快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我国改革开放面临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作出的深刻回答，它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因此，它一经面世便犹如一股春风，很快传遍了全国。还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尚未公开发表之前，《解放日报》、《文汇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发表的文章就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虽也有极个别反对者，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表示赞同的。这表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道出了人们的共同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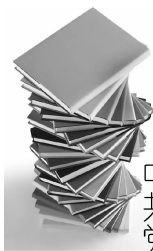
深圳街头的邓小平画像

2月28日，仅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到10天时间，中共中央就迅即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的名义正式向全党传达、贯彻。

紧接着，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的谈话，决定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统一全党的认识。为此，会议还专门发表了公报。5月中旬，中共中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社会劳动保障体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等三个方面的改革要求。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就领会和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加快改革开放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在国家宏观控制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继此之后，中共中央还先后从政法、思想宣传、党的建设等方面采取一些保障措施。

在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过程中，中央的各项改革措施也随之陆续出台，各级各部门的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形成了新的浪潮。

在国企改革方面，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核心，进一步把企业推向市场。1992年2月19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一九九二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的通知，6月30日，国务院又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这两个文件以搞好国有



大中型企业，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为重点，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政府职能，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等方面，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

在配套改革方面，积极推进综合改革，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1992年6月，国家科委、体改委在北京、沈阳、武汉、重庆、中山等市的5个开发区，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以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科技人才分流、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为重点，大胆进行改革试验。财政部决定在浙江、辽宁、新疆、天津，以及武汉、青岛、大连、沈阳、重庆等9个省、市、区率先进行分税制改革，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以取得经验，再行推广。9月，国家计委宣布，从1993年起，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国家计委直接管理的工农业出口计划指标将减少1/3以上。同时加强政策协调，使计划更好地面向市场，发挥国家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

在对外开放方面，进一步开放沿海、沿边、沿江和省会城市，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1992年3月，国务院批准海南省吸收外商投资，开放建设30平方公里土地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在区内实施保税区的各项政策措施。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黑河、绥芬河、珲春和满洲里作为边境地区的开放城市。3月中旬，国务院批准在温州设立经济开发区。

5月，继上海、天津、深圳设立保税区后，国务院又决定兴建大连、广州保税区。山东、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省份也开始筹建保税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按照国际惯例运行。6月，国务院又批准近60个市、县、镇列入对外国人开放地区。其中南宁和昆明将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同月，国务院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5个内陆城市。至此，长江沿岸10个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这样，我国就形成了东部沿海、长江沿岸、周边地区和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改革开放大踏步迈进的背景下，1992年10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经过充分的讨论，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其中，十四大还就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专门阐述，把这一理论概括为九个方面，并把它科学地界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界定，既有利于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把握，更有利于其指导作用的发挥。

党的十四大是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指导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如果说，14年前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和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开辟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的一篇重要讲话和一个重要的大会，那么14年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就是把新时期的历史发展推进到加快步伐并走入新阶段的一篇重要谈话和一个重要的大会。正是以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十四大之后，从1992年年底到1993年下半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又召开了计划、经济等一系列会议，紧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以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条具体实施方案：（1）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2）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3）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4）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5）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具体要求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

架，是在十四大基础上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是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决定》颁布以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其表现是：财税体制实行了分税制；汇率体制采取并轨制；外贸适当放开进出口权限；投资、融资体制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价格管理适当放开一些价格管制。

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我国还相应地颁布了一系列法规，从而在市场作用的有序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法律和法规，对市场主体和产业部门提出了各种不同要求的规范，尽管这些规范还不够完善，但对市场经济的有序化发展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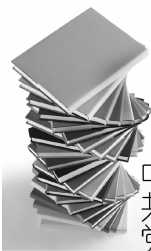
加强宏观调控,制定“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规划

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新一轮改革大潮迅速兴起。这种改革大潮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然而，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是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技术进步而是依靠高投入实现的，因而自 1992 年下半年开始，经济生活中便显露出失衡的苗头，到 1993 年上半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现象就更加突出。

对于经济过热现象，早在 1992 年底，党中央就已发现了苗头，并作了及时提醒。1993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召开经济情况通报会，要求各地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是避免大的损失。之后，江泽民在华东六省一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

1993 年 6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了 16 条措施，以加强宏观调控。

为贯彻落实《意见》提出的 16 条措施，党中央和国务院在 7 月间连续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



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朱镕基要求以中央 6 号文件来统一金融系统的认识，这是落实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对此，他强调要统一三个方面的认识：（1）强化宏观调控，防止经济过热，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2）整顿金融秩序是强化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3）强化宏观调控，不是实行全面紧缩，而是进行结构调整。

为了落实好宏观调控的任务，他还向银行系统领导干部提出了“约法三章”：第一，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第二，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第三，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

在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上，朱镕基又要求有关部门“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同时他还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从明年 1 月 1 日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行财税体制改革，不搞试点。为此，他向财政、税务战线上的全体职工也提出“约法三章”，即：第一，严格控制税收减免；第二，要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停止银行挂账；第三，财税部门及所属机构，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准涉足商业性金融业务，所办公司要限期与财税部门脱钩。

中央除了在上述金融、财税等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外，还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经济发展实行调控：一是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注意克服以往只注重速度不注重效益的倾向，把速度和效益同时摆上重要位置。二是积极引导企业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三是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注重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十四大以后的三年多来，随着宏观调控措施的有力贯彻和对改革、发展、稳定等重大关系的处理，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过度投资得到控制；金融秩序迅速好转，中央银行监管的能力得到加强；物价涨幅明显回落；经济发展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到 1996 年底，我国经济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从而进入了持续稳定增长时期。

实现经济“软着陆”，这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一个不小的成

绩。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在于党中央着重从体制改革入手，在改革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这些改革措施的提出及其成功实施，充分表明我们党和国家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

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增强，不仅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而且还表现为这时党已经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纳入战略日程。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问题。所谓科教兴国，就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科教兴国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这一方面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深入人心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全球发展大趋势审时度势而作出的正确抉择。这一决策表明，科技和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已经引起党的充分重视，党已有了将其付诸实施的决心和信心。

立足科教兴国，注重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但同时也要考虑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承诺要认真履行会议所通过的各项文件。这次大会后不久，中国政府即提出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在1992年7月召开的第23次会议，即决定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委等部门组织编制《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简称《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经多方努力，《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于1994年3月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作为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指导性文件，不仅中央非常重视，而且各部门、各个地方也都非常重视。因此，各地方、各部门在制定本地方、本部门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时，都使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地区和各部门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得到反映。

在全面启动《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之前，党首先对“九五”到2010年工作作了规划。这一规划，党中央从1993年起即开始着手拟订。这一工作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成第二步发展战略，并向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过渡的客观需要。

根据这一需要，1995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形成，使我国向新世纪迈进的步伐更加清晰了。



推进党建和精神文明工作 喜迎港澳胜利回归·····

随着改革开放跨入新阶段，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工作、祖国统一大业也都不断得以推进。

1993年8月20日至25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反腐倡廉提出三条要求：（1）加强对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2）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3）狠刹几股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不正之风。

紧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于10月5日作出《关于反腐败斗

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对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作出具体规定。

为使反腐倡廉工作抓紧抓实，自1993年起，国务院每年召开一次反腐败工作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当年的反腐败斗争。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和部署下，反腐倡廉工作形成强大声势，取得了较大进展。从1993年1月至1996年6月，全国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有26.3万余人（次）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检查纠正了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问题，有5.86万余名科级以上干部检查、纠正了住房方面的问题。公款吃喝玩乐之风有所控制。从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一大批贪污腐化方面的大案要案得到查处。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3.1万余件，结案67.01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有66.93万余人，其中开除党籍12.15万余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处分的37492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0295人，厅（局）级干部1673人，省（部）级干部78人。其中查处的大案要案主要有：北京市委陈希同、王宝森违纪违法案，广东省原人大副主任欧阳德受贿案，中国民航总局原副局长边少敏收受非法所得案等数十起之多。

通过廉洁自律和对大案要案的查处，使党风廉政建设有了一定起色。在此基础上，党中央还针对新形势下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了相应的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制度。1992年到199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一系列条例、准则和规定，其中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党的建设作为一项“新的伟大工程”提到全党的面前，以引起全党的重视。199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1998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条例》和《准则》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各种违纪行为及其处分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是党的纪律具体、系统、完整的条规，是党内处理违纪案件的基本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两个文件的发布，使党的建设在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上不断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曾多次提出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战略思想。

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讲话时发表了这样的高论：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是互相协调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建设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整个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任务加以强调，提出要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把它作为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阐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2年以后，党中央还在全国深入持久地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民主和法制教育、加强党风和廉洁从政教育。通过这些教育，全国先后涌现出一大批体现时代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如孔繁森、徐洪刚、李国安、徐虎、李素丽、吴天祥、王启民、吴金印，等等。

不过，党中央也注意到：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措施不力；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商业上的假冒伪劣和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等等。这些消极现象影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针对这一情况，党中央于1996年10月7日至10日，召开了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全党同志必须抓紧抓好。为将精神文明建设切实落到实处，《决议》明确提出，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

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也是精神文明建设总的要求。《决议》还规定了今后15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决议》还提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要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进一步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十四届六中全会后，为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和指导，中共中央于1998年5月26日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建立了相应机构。自此，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便在有组织有领导的状况下进行。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当然也是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企盼。

这一事业进入80年代以后，逐渐呈现出喜人的景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日趋完善，80年代初“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完成统一大业的步伐就更快了。1984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从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自1999年12月20日起中国政府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与此同时，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也出现了积极变化，民间的接触和交流日渐增多。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后，中国政府即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经过近5年的努力，于1990年4月4

日提请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颁布，决定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这部《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体现。其原则精神是：“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把“一国两制”方针确定下来。这部前所未有的法律充分体现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照顾了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香港各阶层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关照到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利益，因而在祖国大陆、香港和国际社会都获得了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

《基本法》的通过和颁布，标志着香港回归祖国进入后过渡期。

然而，香港的后过渡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92 年 10 月，上任不到 3 个月的第 28 任港督彭定康，对香港的平稳过渡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对此，中国政府一方面予以严正驳斥，争取英方回到联合声明的立场上来；另一方面又坚持“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港人的共同参与来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

1993 年 7 月 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简称“预委会”）。预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准备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1995 年初，英方终于表示了愿意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在与中方的合作上逐渐积极起来，这为后过渡期顺利行进了绿灯，从而受到各方的欢迎。

在诸多条件日趋和顺的情况下，1996 年 1 月 26 日，由 94 位香港委员和 56 位内地委员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在北京宣告成立。筹委会既是一个工作机构，同时又是一个权力机构，它一经成立就肩负起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切有关事宜。距筹委会成立刚刚两天时间，国务院、中央军委便发布公告：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部队组成，同一天在深圳市公开亮相。

8 月，推选委员会（简称“推委会”）参选人员开始报名。11 月 1 日至 2 日，筹委会第六次全会，从 5 800 多名报名人选中，推选产生出 400 位推委会委员。15 日，推委会正式成立，并推选出 3 位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由此揭开了全面组建特区政府的序幕。12

月11日，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董建华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2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向这位“第一任长官”颁发了国务院的任命。1997年2月20日，董建华任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的23名高级官员。这样，香港第一届政府宣告诞生。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隆重举行。英国米字旗和港英的皇冠狮子旗徐徐降下，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五星花蕊紫荆花区旗冉冉升起。香港区旗的升起，意味着在香港问题上中国百年耻辱的终结，香港这个离散了百年的游子又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洗刷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庆典。在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辉映下，江泽民主席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结束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立即宣誓就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由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为香港前途设计的蓝图，就在这一刻变成了现实。

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还同葡萄牙就澳门问题展

开磋商，经过四轮谈判，于 1987 年 4 月 13 日双方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将于 1999 年 12 月 20 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



澳门特别行政区区徽



中共党史青少年读本

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香港、澳门胜利实现了回归。同样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了可喜变化。海峡两岸结束了长期隔绝的局面。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旅游、经商的人次一年比一年增加，台胞在大陆的投资急剧增长，两岸交往特别是文化交流得到较快发展。1993 年 4 月，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举行会谈，这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团体最高负责人之间的直接会谈。

1995年春节来临之际，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发展两岸关系的八条主张：（1）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5）面向21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6）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7）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8）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

这八条主张进一步发挥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对台问题上所持的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尊重历史与现实，既坚持原则又求同存异的公正立场，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两岸关系的新建议和新思路，因而立即受到了海内外一切关心中国统一的人们的热烈欢迎。

根据这八条主张，中央人民政府为进一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开展了多方面工作，同时对“台独”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和民间往来交流活动继续得到发展，祖国统一大业正在稳步前进。

在致力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同时，我国的整个对外关系也不断取得进展。在对外关系方面，总的来说，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与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逐步改善和发展，多边外交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1996年4月，中俄两国在睦邻友好的基础上，双方进而又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成功实现了互访，双方决定共同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我国这一系列对外工作的新进展，使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友好合作的空间更加广阔。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按照“三个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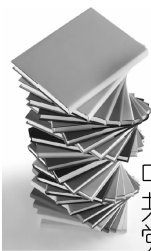
要求，建构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未来

正当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入新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以高昂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时候，历史巨人邓小平与世长辞。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种纷繁复杂的形势之下，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便立即引起世界的瞩目和国人的关注。

当此之际，中国共产党于 1997 年 9 月 12 日胜利地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江泽民郑重地向世人宣布，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江泽民还富有远见地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举什么旗，实质上就是亮明一个政党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对于旗帜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很早以前就曾指出，革命的人们要实行“主义的结合”，“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有所指望，回答向何处去；知所趋赴，回答走什么路。江泽民在邓小平逝世后，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关头，明确提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无疑也是要让人们“有所指望，知所趋赴”，并团结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之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我们党对这一理论认识发展的结果，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历史性决策。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无疑是要以邓小平理论为灵魂，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推向前进。党的十五大也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对我国跨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作出战略性部署。即：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为完成党的战略任务，十五大从两个方面作出明确要求：第一，进一步重申了党的基本路线，并深刻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十五大之所以再次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就是要使人们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第二，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搞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问题。对此，江泽民在大会上明确讲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任务，以改革为动力的同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

党的十五大是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为我国进入21世纪作了全面总动员，并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理论上为跨世纪发展作了准备。

党的十五大之后，全党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为落实十五大提出的各项战略任务而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1998年1月7日至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1998年农业和农村工作要做到“四稳一突破”，即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定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稳定农产品总量，稳定农村社会秩序，力求农村改革有新突破，产业结构调整有新进展，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有新提高，农民收入有新增长。

3月5日至1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对1998年的政府工作提出了8项建议：（1）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2）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新的突破；（3）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4）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5）积极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6）努力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7）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8）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这次会议对政府机构改革问题提出了基本框架：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和撤销那些直接管理经济的专业部门，加强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管部门，按照权责一致的要求，调整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国务院直属机构与办事机构也将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

大会通过了李鹏所作的报告，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随即，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4位副总理与600多位中外记者见面。在人民大会堂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将本届政府的施政纲领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就是确保199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小于3%，人民币不贬值；“三个到位”就是国企改革到位，金融改革到位，机构改革到位；“五项改革”就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金融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

3月24日，新一届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朱镕基总理提出五项要求：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从严治政，敢于得罪人；清正廉洁，惩治腐败；勤奋学习，刻苦工作。并提出约法三章：在国内考察中要轻车简从；精简会议，压缩时间，减少人员；减少应酬，集中精力研究处理重大问题。要励精图治、高效廉政，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旺盛的斗志做好跨世纪一届政府的工作。五项要求、约法三章，要言不烦，展示了新一届政府的新形象。随后，各项改革方案也纷纷出台。

一是大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1）落实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由政府、企业、社会共同承担。（2）建立国务院稽察特派

员制度，向国有企业派遣稽察特派员以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3)成立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以加强企业党的建设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这些配套措施的实施，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二是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为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1998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成立金融工委。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开始在全国建立跨省、市、自治区的大区分行，强化垂直领导，加强金融监管；国有商业银行也进行内部机构调整，以减少支行，压缩人员，提高效益。

三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98年4月底，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会议，确定改革的的原则是：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6月初，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6月6日，朱镕基签发国务院第244号令，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以此加强粮食收购管理。

四是积极稳妥地进行国务院机构改革。1998年6月19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了新一届政府组建以来，各部门“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方案的制定工作，对下一步实施“三定”工作作出部署。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各部门的“三定”方案，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转交给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地方的职能有200多项；在部门之间调整转移的职能100多项；部门内设的司局级机构减少200多个，精简了1/4；人员编制总数减少47.5%。

随着国务院机构设置改革的完成，人员定岗分流工作全面展开。国务院要求做到“四个结合”：把人员定岗和分流与优化结构、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结合起来；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结合起来；与从严治政、加强机关建设结合起来；与加强法制建设结合起来。截至1998年6月，大部分国务院部门定岗分流工作结束，使3年内完成全部富余人员的安置任务有了保证。

上述改革的成功，实现了新一届政府的承诺，为完成九届人大

一次会议的各项部署提供了有力保证。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意想不到的风险和挑战随时都会给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带来威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的特大洪涝灾害，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严重冲击，对此，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战，成功地渡过了难关；1999年，党又领导人民胜利地进行了三大政治斗争：一是严厉批驳了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所鼓吹的“两国论”，对其企图分裂祖国的行径给予坚决打击；二是坚决取缔了“法轮功”邪教组织；三是严正抗议和声讨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

面对来自国际国内的考验，党还就自身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从1998年到2000年底，以整风精神分期分批对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三讲”教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全党共有70万名领导干部参加了“三讲”教育。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对这次教育活动十分关注，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仅直接听动员报告、参加民主测评和帮助整改的就有500万人以上。广大干部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经受了一次党内民主生活的严格锻炼，在坚持群众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等方面得到明显提高。实践表明，“三讲”教育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一次创造性探索和成功实践，是延安整风精神和党的“三大作风”在历史新时期的丰富和发扬。这一活动获得了“干部受到教育，农民得到实惠”的良好效果。

2000年初，江泽民又提出以“三个代表”的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为了把对这一重要思想的学习和贯彻引向深入，党中央着重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2000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具体制定了《关于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意见》，要求从2000年冬、2001年春开始，全国县（市）部门、乡镇、村的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用两年左右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二是把党的建设作为重点课题，

广泛开展专题调研。中央有关部门组成课题组，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了解各方面情况。除此之外，各地及许多部门也展开了多种形式的调研，为思考 and 解决新形势下的党建问题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在此基础上，200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全面总结党的80年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的同时，还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也就成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指针。它必将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十二、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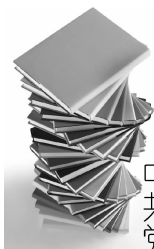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与小康目标

总体实现

党的十五大以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辉煌成就。到 2000 年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九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1997 年后，由于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我国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九五”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2000 年达到 99 214.6 亿元，人均 7 858 元。继 1995 年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之后，又在我国人口增长 3 亿左右的情况下超额完成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任务。在经济持续增长和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收入连年增加，2000 年达到 13 395 亿元，5 年累计超过 5 万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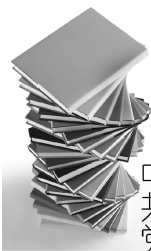
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经济总量由世界第9位跃居第6位。

到2000年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壮大。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通过优化结构、深化改革，经营状况明显改善，摆脱了长期亏损的局面，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国有小型企业放开搞活的步伐加快并取得明显成效。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深刻变化，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初步形成，开创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财税、金融、流通、住房和政府机构改革继续深化。市场体系建设全面展开，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加快，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形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加速发展，市场调节比重不断增加，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

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随着对外开放领域的拓展，我国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利用外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200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4743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95年的第11位提升至第8位。在对外贸易中，出口商品的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在实现由初级产品为主向加工产品为主的转变后，又实现了从一般加工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为主的转变。“九五”期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898亿美元，比“八五”时期增长80%。国家外汇储备超过16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外商投资领域不断拓宽，外商直接投资的科技含量增加，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增多。

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基层民主活力增强。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民族、宗教和侨务工作取得新进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切实贯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新成效。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全面进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九五”时期，科技经费投入累计达5828亿元，是“八五”时期的1.9倍，平均每年取得科技成果3万余项。航空



航天、信息、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高科技领域取得一批重要成果。“神舟”号飞船试验飞行成功，载人航天事业迈出重要步伐。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稀土材料应用和生物技术等重大科研成果产业化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从 1995 年的 36.2% 增加到 2000 年的 85%。大中城市文化设施建设加快，广播电视覆盖网进一步扩大，到 2000 年底，全国广播人口覆盖率达 92.5%，电视人口覆盖率达 93.7%。医疗保健体制和卫生体制改革迈出较大步伐，城镇社区卫生服务、农村合作医疗和初级卫生保险体系进一步健全，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有新的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九五”期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0.6%，市场商品供应充裕丰富，有效供给水平明显提高，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200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6 280 元和 2 253.4 元。剔除价格变动因素，“九五”期间年均增长 5.7% 和 4.7%。“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从 1995 年的 6 500 万减少到 2000 年的 2 500 万。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险制度初步确立。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生态环境有较大改善。“九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达 13.87 亿元，集中力量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我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的局面大为改观，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得到缓解，经济发展的后劲大为增强。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加大。大河大湖的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全面展开，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随着“九五”计划的完成，我国生产力水平又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得到加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就继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部署。2000 年 10 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加快推进现代

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今后五到十年，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这个《建议》，国务院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这个《纲要》，从而为进入新世纪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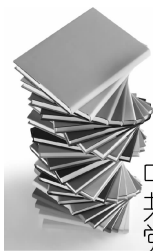
党的十六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纲领的制定……

随着“十五”计划的全面付诸实施，面对进入新世纪后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

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筹备十六大期间，江泽民明确指出：党的十六大，将进一步制定党和国家在新世纪之初的行动纲领，进一步统一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坚定信心，鼓舞干劲，同心同德地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前进，使社会主义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保持高度稳定和强大生机，使我们党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确保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代表2114人，特邀代表40人，代表全党6600多万名党员。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六大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围绕这一主题，江泽民在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总



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13 年的基本经验，进一步阐明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鲜明地回答了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的目标等重大问题。

报告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旗帜，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要走的道路，就是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新世纪前 50 年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根据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勾画了宏伟蓝图。报告指出：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综观全局，21 世纪头 20 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 21 世纪头 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意义十分重大。

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全党要把这一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入党章，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成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大会作出的一个历史性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

大会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占一半以上，全部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龄55.4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8.6%，标志着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充满希望。

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吴邦国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党的十六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和继往开来的大会载入史册。十六大以后，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踏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促进科学发展的各项决策……

按照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部署，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开拓前进。同时，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科学发展的决策。

2002年12月5日至6日，胡锦涛率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回顾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重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告诫，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开拓进取、团结奋斗。

正当全党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的时候，2003年春，我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面对这场严峻考验，全党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疫情，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夺取了抗击“非典”和促进发展的双胜利。

通过抗击“非典”斗争，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等突出矛盾。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从今后的工作来说，“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促进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加促进社会发展的投入，增加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投入。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发展规划中加以体现，在工作部署中加以落实”。此后，胡锦涛在江西、湖南视察时又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必须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决定》阐明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指导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党对 20 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既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又符合当代中国国情。为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中央、国务院相继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从 2003 年下半年开始，面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党中央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宏观调控。其中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针对粮食播种面积连续 5 年减少，粮食产量持续下降的局面，进一步加强农业，促进粮食生产。二是针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增长过快的问题，积极改善投资结构。经过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抑制了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避免了经济发展大的起落，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2006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又好又快”发展的方针，更加体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促进了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中央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04 年 12 月，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着眼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上，2005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2004 年以后，中央连续颁发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就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化农村改革等作出部署，提出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2005 年 12 月 29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9 次会议决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



废止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农业税的取消，终结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制定“十一五”规划，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部署。为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提出，“十一五”期间的主要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得到有效控制；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继续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建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充分体现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基础上，党中央继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003年3月21日，温家宝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加大西部开发力度、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支持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和振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强调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随后，国务院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标志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基本形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和谐。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党的重要奋斗目标。随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得到逐步落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实现社会和谐的任务更加突出。十六大以后，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全面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深化了对社会和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的认识。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确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2005年2月，在党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发表讲话，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

在此基础上，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工作部署。《决定》提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



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决定》从五个方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部署：一是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道德基础；四是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五是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更加清晰。这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又一个新的认识成果。

在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措施。

在促进协调发展方面，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通过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通过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通过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通过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通过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

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保证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坚持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坚持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制基础；坚持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坚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在建设和谐文化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形成人人促进和谐的局面。

在完善社会管理方面，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社区建设，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在增进社会团结和睦方面，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增强全社会创造活力，形成万众一心共创伟业的生动局面；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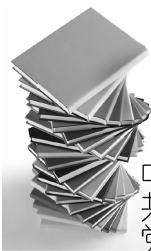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任务，并以此为重点坚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六大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根据党的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向全党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要求。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着重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指导全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



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能力建设，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明确要求。

为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更好地肩负起历史使命，党中央把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根据党的十六大的部署，2004年11月7日，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意见》提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从目标要求上，就是要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从总体进程上，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分三批进行，每批半年左右时间。第一批是县及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第二批是城市基层和乡镇机关。第三批是农村和部分党政机关。在方法步骤上，整个教育活动分学习动员、分析评议和整改提高三个阶段进行。

从2005年1月开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陆续展开。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周密部署，各级党组织精心组织，广大党员积极参与，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使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实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提高了素质能力，增强了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一些软弱涣散和不够健全的基层党组织得到整顿和加强，党的工作覆盖面明显扩大，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更加巩固。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行动更加自觉，党员干部的作风进一步改进，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些重点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各地区各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理清了发展思路，努力解决影响

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些主要问题，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各级党组织在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管理、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建立健全基层党的建设责任制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务实管用的新制度，推动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建设。

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党坚持不懈地加强先进性建设，不断取得重要成果，为党更好地完成执政使命提供了重要保证。

2006年6月30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总结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宝贵经验，要求全党要紧密结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紧密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紧密结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实践，进一步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

保持党的先进性，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克服党内的腐败现象。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注重反腐败制度建设和创新，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监督、制度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十六字方针，即“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要求抓紧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把反腐倡廉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在推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过程中，党和国家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不断充实和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内容。2004年2月，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4年9月，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央办公厅也先后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

暂行规定》等法规。2005年7月，中央纪委讨论通过《关于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试行）》。2007年4月，国务院公布《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此外，中央纪委还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关于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的暂行规定》、《关于中共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履行监督职责的意见》等一系列配套规定。这些法规和规定的出台，初步形成了以党章为核心、以监督条例为主干，以一系列配套规定为重要补充的党内监督法规制度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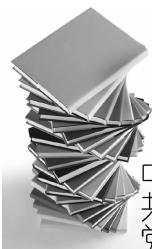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这一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相互促进，有效地加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了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十三、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前进

党的十七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部署

党的十六大以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加快推进和深化各项改革，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重大成就。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七大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作出新的发展部署。

面对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还面临着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



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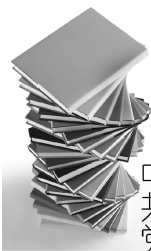
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并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入手，着力解决这些问题。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全面阐述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政治、思想和理论上为十七大的召开作了准备。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全党7300多万名党员。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大会通过了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胡锦涛在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鲜明地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

报告对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作了精辟概括，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回顾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报告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根本要求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根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报告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具体内容是：

第一，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

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第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第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第四,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第五,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十七大报告描绘的宏伟蓝图,为继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

大会一致同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会认为,把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写入党章,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10月22日,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

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胡锦涛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贺国强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十七大号召全党，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奋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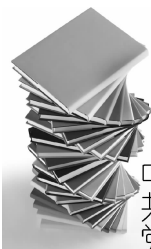


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推进和积极应对各种挑战……

党的十七大之后，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下开始了新的奋斗征程。改革开放继续深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并在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局势的各种考验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2008年初，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发生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面对特大自然灾害，党中央和国务院立即作出有效部署，调集各方面力量抢险救灾，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亲赴第一线指挥，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迅即奔赴灾区展开救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形成了抗御灾害的强大力量。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特大自然灾害，并且在抢险救灾斗争中再次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伟大精神。

在抗御自然灾害的同时，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根据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和我国经济形势的新情况，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采取措施，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避免出现经济大起大落；继续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坚





2008 年抗击雪灾

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对外经济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劳动安全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2008 年 2 月，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目标，要求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全会还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确定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

能，加强能源环境管理机构，整合完善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行业管理体制，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该方案经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后正式实施。

举办奥运会，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在接连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和反华势力干扰破坏的情况下，党中央强调，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都要顺应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履行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确保办成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运动会。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我国体育健儿取得金牌榜第一的优异成绩，充分体现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充分体现了团结、友谊、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充分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9 周年到来之际，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关键技术国家，对全国人民产生了极大的精神鼓舞。

在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方面，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迈出较大步伐。党中央、国务院于 2008 年 6 月 8 日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用 5 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完善



神舟七号

政策、健全服务、规范管理，逐步形成集体林业的良性发展机制，实现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林区和谐的目标。《意见》还明确规定，实行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林地的承包期为70年，承包期届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为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10月9日至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提出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大举措、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的重大安排，对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

2008年下半年，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复杂变化，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为规避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10项措施。12月8日至10日，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9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立足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加强社会建设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2009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09年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主线，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扩大国内需求；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强科技支撑，增强发展后劲；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城乡就业，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系列决策迅速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势头。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国际金融危机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出口大幅下降，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有的甚至停产倒闭，失业人员大量

增加，农民工大批返乡，经济增速陡然下滑。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3.5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8.7%；财政收入 6.85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1.7%；粮食产量 5.31 亿吨，再创历史新高，实现连续 6 年增产；城镇新增就业 1 102 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 175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5 153 元，分别增长 9.8% 和 8.5%。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道路上又迈出坚实的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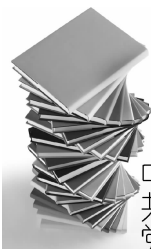
继续推进军队国防建设、外交工作和祖国

统一大业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继续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同时在发展对外关系方面，积极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不断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并继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2004 年 9 月 20 日，新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我军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要坚持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全局，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要适应军队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加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建立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不断提高我军的正规化水平。同年底，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胡锦涛主席着眼于实现党的三大历史任务，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明确提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肩负的历史使命，这就是：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对新形势下我军地位作用、职能任务、发展目标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是人民军队历史使命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2005 年 3 月 13 日，胡锦涛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



表团全体会议上指出：全军同志要正确认识形势，坚决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把军队建设和改革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努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2007年8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又强调：切实履行好这一历史使命，是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人民解放军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有效履行这一历史使命来展开，各项建设都要围绕提高履行历史使命的能力来进行。

在继续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前进道路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增强全军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精心组织战略战役演练，集中力量推进重点武器装备建设，重视抓好综合保障和国防动员工作。加强经常性战备工作，维护边防、海防、空防安全。落实军队编制调整改革，继20世纪80年代中期百万大裁军和90年代中后期裁军50万之后，决定到2005年前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坚持从严治军，重视军事立法工作，严格按条令条例管理教育部队，推进人才战略工程，提高正规化水平，确保军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



推进军队现代化

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全方位开展对外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积极推动同各大国关系稳定发展方面，加强同美国在经贸、能源、科技、卫生、反恐、防扩散、执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努力扩大利益交汇点，维护中美关系总体上稳定发展的势头。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双边合作和双方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的合作，加强双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深化两国经贸、投资、能源、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欧全面合作，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增加共识，加强双边贸易和双方在科技、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充实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推进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在周边外交方面。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实施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建立“10+1”合作机制，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在区域合作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深化反恐合作，采取主动措施推进成员国在经贸、能源资源、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同印度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订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巩固同越南、朝鲜、老挝、古巴的传统友谊，推进同巴西、印度、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和协调。

重视和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改革方案的沟通和磋商，主动参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利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资源，增强我国防范和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妥善处理国际敏感问题和突发事件。在解决朝核问题、伊拉克问题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党和政府还利用各种双边和多边场合，阐明我国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决心，积极倡导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2005年4月2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雅加达亚非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强调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中心任务，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市场；同时，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愿意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主张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党中央、国务院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的工作，广泛团结港澳各界人士，共同维护和促进香港和澳门的繁荣、稳定和发展。

中央对香港与澳门的繁荣和稳定给予了全力支持，不仅采取有力措施帮助香港、澳门成功地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而且通过进一步加强内地与港澳的联系，开展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港澳同内地的共同发展，为香港和澳门的繁荣与稳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中央政府和大陆同胞的支持下，香港和澳门经济更加繁荣，民主有序发展，民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稳定。广大港澳同胞以主人翁的姿态关心祖国、热爱港澳，呈现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港澳回归之后，海峡两岸关系更加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关注。党中央根据海峡两岸关系和台湾形势的变化，在原有政策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主张，采取了一些新举措，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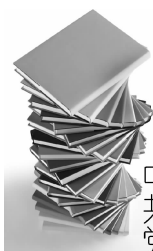
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



香港夜景

见，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四个“决不”的主张，在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产生了重大反响，受到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将中央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反对分裂祖国的大政方针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部法律的制定和通过，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一贯立场，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在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推动下，经过多方努力，两岸间的政党交流成功开启。2005年，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以及新党主席郁慕明相继率团访问大陆。胡锦涛总书记分别同他们会见、会谈，共同发表公报，达成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等多项共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有关方面先后举办的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大陆方面共推出48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中国共产党和亲民党有关方面也举办了两岸民间精英论坛。通过两岸政党的广泛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打开了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局面。2007年9月，第62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陈水扁当局唆使极少数国家提出的所谓“台湾加



入联合国”提案。2008年3月，台湾举行地方领导人选举，在“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的陈水扁当局终于被台湾人民所抛弃，国民党重新取得执政地位，两岸关系出现了有利于和平发展的新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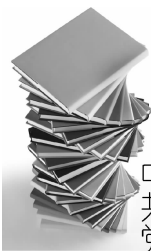


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关键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条件下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根据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部署，党中央坚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加紧建立健全保证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体制机制，努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加强理论武装工作，推动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二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对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作出规划。三是加强人才工作，研究全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四是加强基层党的建设，落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五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推进党务公开，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事务中的参与、管理、监督作用。六是制定和实施今后5年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党的十七大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根据中央统一要求和部署，学习实践活动从2008年3月开始试点、同年9月全面启动，自上而下分三批进行，到2010年2月底基本结束，共有370多万个党组织、7500多万名党员参加。这次学习实践



活动，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要求，牢牢把握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主题鲜明，领导有力，组织严密，措施得当。经过全党共同努力，学习实践活动基本实现了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加强基层组织的目标。一是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明显增强，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的自觉性明显提高，对事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科学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领导和推动科学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科学发展水平得到有效提升，进一步理清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科学发展思路，制定了一批推动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解决了一批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了一批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三是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有力推动了中央惠民利民政策的落实，解决了大量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四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到明显加强，扩大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丰富了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改进了基层党的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党中央于 2009 年 9 月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研究和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深刻分析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系统总结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 60 年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作出全面规划，强调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党的建设总体部署，按照党章要求，着眼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着眼于增强全党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

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全会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一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主要任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二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广泛凝聚全党意愿和主张，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三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坚持五湖四海，拓宽视野选拔干部，广辟途径培养干部，满腔热情爱护干部，严格要求管理干部，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四是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着力扩大覆盖面、增强生机活力，使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使广大党员牢记宗旨、心系群众。五是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全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以思想教育、完善制度、集中整顿、严肃纪律为抓手，下大气力解决突出问题，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六是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

腐败斗争新成效。

全会强调。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是全党的重大政治责任。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全会决定精神，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党建工作调查研究，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推进党建理论创新，确保党的建设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努力在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见到成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这次全会的召开，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十二五”规划的制定

“十一五”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走向又好又快发展。国家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中长期科技、人才、教育规划纲要，确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努力实现各类人才队伍协调发展。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得到加强，取得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超级杂交水稻等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2008年8月1日我国第一条城际间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开通，到“十一五”期末的2010年，我国高速铁路投入运营里程已达7 000多公里，成为世界高铁运营里程最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坐在时速350公里的国产“和谐”号列车上，仅需29分钟就能从北京来到天津。高科技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2008年9月27日，“神舟七号”飞船航天员翟志刚在太空向祖国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实现了中国人的第一次太空漫步。我国航天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在推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我国还重点研究部署了推进西藏、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工作，并对加快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2010年1



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开通

月，中央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研究制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强调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紧紧抓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西藏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努力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西藏。2010年5月，中央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出台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政策举措，实施稳疆兴疆、富民固边战略，强调始终把推动科学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在中央正确部署、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经过西藏、新疆人民的共同努力，推进西藏、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工作正在全面有序展开。

经过五年的努力奋斗，我国胜利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成就，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十一五”规划的各项任务即将完成时，党中央开始就“十二五”时期的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进行科学谋划，研究部署。

2009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问题。“十二五”规划建议的起草工作由此正式启动。

2009年10月，党中央直接部署“十二五”时期30个重大课题，组织有关方面专家进行深入研究，国内67个部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1万多名专家参与研究。2010年2月，党中央作出决定：成立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负责文件起草工作。

2010年，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就“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和建议。7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审议“十二五”规划建议稿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建议》在提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前，又广泛征求了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党内老同志和十七大代表的意见，吸取了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是统一全党认识、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

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全会号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

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明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符合党心民心，符合时代潮流，符合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十七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

十七届五中全会深入总结“十一五”时期我国发展成就和经验，综合考虑未来国际国内发展趋势和条件，提出了今后5年我国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即：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这些目标和任务，突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深化改革开放等方面的要求，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为推动“十二五”时期的科学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

宏伟蓝图已展开，崇高使命在召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地推进科学发展，更加主动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